

# 超越分歧 聚焦合作



Hong Kong Forum on  
U.S.-China Relations  
香港中美論壇



## 出版 中美交流基金会

主 席 董建华  
发 行人 黄德荫  
主 编 张 平 常 虹  
顾 问 朱英璜  
编 辑 彭 慧

《中美聚焦文摘》是一份双月刊杂志，刊登中美两国具影响力的领袖和学者有关两国相关议题的评论文章。

您的意见和建议，请电邮至  
[digest@cusef.org.hk](mailto:digest@cusef.org.hk)

公司地址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3 号亿利商业大厦 20 楼  
电 话 (852) 2523 2083  
传 真 (852) 2523 6116



[cn.chinausfocus.com](http://cn.chinausfocus.com)

关注 Facebook 和 Twitter: @ChinaUSFocus

特别鸣谢

Chatham Strategies 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鼎力支持

## 目录

### 开幕致辞



#### 相互依存的世界

P. 05

冯国经 (Victor Fung)

### 论坛概要

P. 08

### 中美关系的挑战与管控



#### 合作的重要性

P. 13

玛丽·罗宾逊 (Mary Robinson)



#### 超越分歧 走向合作

P. 16

吴作栋 (Goh Chok Tong)



#### 在问题中成长

P. 19

让·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



#### 日本的前车之鉴

P. 21

福田康夫 (Yasuo Fukuda)



**打破狂热的敌意** P. 24

史蒂夫·欧伦斯 (Steve Orlins)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P. 27

曾培炎

**全球经济复苏**



**前方的道路将颠簸不平?** P. 31

雅各布·卢 (Jacob Lew)



**建立更持续、更包容的  
经济复苏** P. 34

毕井泉



**全球重置** P. 36

何亚非



**增长、通胀和政策的十字  
路口** P. 39

斯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



**竞争会持续下去** P. 41

刘遵义 (Lawrence Lau)



**中美相悖的宏观政策将增  
加 2022 年的不确定性** P. 44

钱颖一

**贸易与投资**



**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交织** P. 47

查尔斯·布斯坦尼 (Charles Boustany)



**进一步推进互利共赢的  
中美经贸关系** P. 49

张晓强



**从挑战中看到机遇** P. 51

王冬胜 (Peter Wong)



**权力转移 呼唤新规则** P. 53

赵令欢 (John Zhao)



**商业是一项团队运动** P. 54

克雷格·艾伦 (Craig Allen)

**全球供应链**



**如何给经济车轮注入润滑油** P. 57

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现在，坏消息是……** P. 59

威廉·艾伦·赖因施 (William Reinsch)



**全球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和出路** P. 62

王一鸣



**半导体全球供应链有分裂的风险** P. 64

郑力

**气候变化**



**我们没有时间了** P. 67

杰佛瑞·萨克斯 (Jeffrey Sachs)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P. 69

解振华



**中国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措施** P. 71

刘燕华

**人文交流**



**一种与众不同的交流** P.75

马克斯·鲍卡斯 (Max Baucus)



**一位乐观主义者的几句话** P. 77

查尔斯·福斯特 (Charles Foster)



**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P. 80

章新胜



**推动人文交流是恢复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P. 84

陈文玲



**误入歧途的傲慢** P. 87

王栋

编者按:

2022年1月19日至21日,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举办了第三届香港中美论坛,主题为“超越分歧 聚焦合作(Beyond Differences, Towards Cooperation)”。三十余位世界领袖与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围绕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合作发言、交流。本期《中美聚焦文摘》将完整刊登本届论坛的主题发言(呈文所需,文字记录略作编辑)。

# 相互依存的世界



冯国经 (Victor Fung)  
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冯氏集团主席

**我坚信美中贸易战现在应该终止。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和中国消费增长放缓，我相信双方都会出现这样的意愿。**



每一年，这个论坛上的目标都是针对美中关系现状开展深思熟虑的对话，而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世界各地领导人和专家的帮助下，我们希望通过全球和双边视角探讨这一关系。因为我们认识到，美中关系的发展不是独立于外界的，了解和评估美中关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今年的主题是“超越分歧 聚焦合作”。我们将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这一主题，包括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和投资、全球供应链、气候合作以及人文交流。

拜登政府执政一年来，美中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和争论。上届政府期间，美中关系框架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上个月，“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到期，问题是：美中贸易接下来如何发展？

大量报道认为，在某些备受瞩目的问题上，两国关系仍然紧张，甚至不断恶化。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两大经济体仍然高度相互依存。贸易和投资数据体现了这一现实。2020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19年，对华出口支撑了美国约120万个工作岗位。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公司仍然长期致力在中国市场发展，把中国视为其全球战略的五大重点地区之一。同时，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

《格拉斯哥宣言》是多边思维的胜利。

---

另一项积极因素，是关于美中两国经济“脱钩”的预测似乎为时过早，就像关于“马克·吐温之死”的新闻报道一样。近年来，我们确实看到两国长期形成的贸易模式发生了变化。但经验告诉我，它的主要原因是数字技术，而不是“脱钩”。目前为止，疫情造成的物流问题是扰乱全球供应链的最大原因。如果没有这些瓶颈制约，贸易流动原本可以更加强劲。

中国高层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之间进行会晤，这让人感到鼓舞。同时，针对美国企业在签证方面的担忧，中国采取行动，提升了外国企业管理人员及其家属的快速入境通道。

还有其他希望的迹象。两国领导人正认真沟通，解决实质性问题。在我看来，高层交流的基调已经明显改善。

上个月，美国和中国合作，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其它常任理事国一起，罕见地联合承诺拒绝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11月，两国

签署《中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我认为，对于世界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格拉斯哥宣言》是多边思维的胜利。

展望未来，我们预计会出现大量媒体报道，纪念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 50 周年。当然，那次访华发生在美苏超级大国竞争的冷战时代。但我相信，仍然可以从尼克松总统所说的“改变世界的一周”中获得启示。

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历史性会晤时的美方讲话已经解密。尼克松总统说：“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是对世界上一种新形势的认识……我们可以找到共识，尽管存在分歧，从而建立起一种世界结构，让双方都可以安全地按照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发展。”

如今，世界再次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

如果我是企业家，有人问我除了最重要的气候问题，美中合作关系里的另外两项重点工作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全球经济的疫情复苏，以及，完善促进推动可持续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多边体系。

我想分享两项建议和一份意见，供论坛考虑。

首先，为了加速全球经济复苏，我坚信美中贸易战现在应该终止。随着美国通货膨胀加剧以及中国消费增长放缓，我相信双方

“

尼克松总统说：“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是对世界上一种新形势的认识……我们可以找到共识，尽管存在分歧，从而建立起一种世界结构，让双方都可以安全地按照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发展。”



为了加速全球经济复苏，我坚信美中贸易战现在应该终止。

都会出现这样的意愿。这场疫情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2018年年中，惩罚性关税和制裁首次针对中国实施。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发生争执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

在我看来，鉴于疫情造成的严重破坏，继续贸易战只会阻碍两国恢复全面经济健康以及全球范围内保持经济稳定的努力。未来，希望美国和中国将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双边贸易问题。

第二，美国和中国拥有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领导亟需的全球行动，共同完善贸易投资多边体系。该体系是大约75年前设想出来的，现在必须适应数字商务、气候问题、疫情和包容性的需要。基于这种思考，旨在振兴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对话已在进行。这是值得欢迎的，但这么艰巨的任务不能只交给日内瓦。

在亚太地区，两个庞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在形成，覆盖全球大约1/3的人口和1/3的GDP和贸易。它们分别是今年1月1日生效的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及三年前生效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两大自贸区拥有许多相同的成员。中国是RCEP的主要国家，现已申请加入CPTPP。而大家也知道，美国放弃了引领CPTPP的领导地位，没有加入这两个自贸区。

如果美中现在携手合作，将这两大自贸区结合起来，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当然，这需要时间协调这些自贸区的差异，还可能需改革世贸组织来促进这一过程。但其结果可能远远大于各部分的总和。我相信，它可以为新的多边体系奠定基础；在未来75年以及更遥远的未来，它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贸易和投资的性质、需求。

最后，我想分享的观点来自于尼克松总统对毛主席说的话，即各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发展。

今天，和美国、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许多公司面临着巨大压力，需要做出选择，否则有可能违反政府政策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过去几十年一直鼓励美中经济往来，但现在做出选择是不可取的，甚至是不可行的。此外，通过跨国经营，公司为其各自国家的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创造财富。疫情之中，它们维护了电子商务的正常运转，帮助到世界各地的消费者。

所以，我认为，在任何国家经营的时候，跨国企业应遵循的原则是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对彼此的法律和制度的理解出现分歧和矛盾时，我认为最好通过多边渠道解决。



在亚太地区，两个庞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在形成，覆盖全球大约1/3的人口和1/3的GDP和贸易。

# 报告摘要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在此背景下，来自全球的重要嘉宾在 2022 年 1 月 19 日 -22 日期间参与网络讨论，呼吁中美两国在重大全球问题上缓和关系。此次主题为“超越分歧 聚焦合作”的论坛由中美交流基金会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举办。论坛上，三十多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前政要、政府前高官、工商领袖、知名学者齐聚一堂，详细研讨这些挑战，并为新的一年提出富有成效和乐观的应对方案。同时，指出了可以取得成果的领域和方式，特别是在经济复苏、贸易、气候变化以及促进人文交流方面。

论坛发言嘉宾包括多位前国家领导人，如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以及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每一年，这个论坛的目标都是针对中美关系现状开展深思熟虑的对话，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冯国经博士说。他强调指出，虽然

中美政治关系似乎日益恶化，但两国经济仍然深度相互依赖，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尽管双边关系处于充满挑战的时刻，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表示，中美关系仍然是全球成功和稳定的关键，特别是在未来的战略问题方面。他认为，这一关系应遵守三项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同时，“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发言嘉宾和小组讨论专家提到了此次疫情造成的负面经济冲击，表示中美经济的良好表现对于重启全球经济意义重大。美国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解释了通货膨胀的风险、关税问题以及气候变化政策的必要性，同时强调“美国和中国重归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接触与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从而促进每个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全球供应链问题最近成为热点话题，也深刻影响到中美两国。目前，两国消费者都受到负面影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



事长王一鸣讨论了全球供应链的三大问题：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供应链的横向和纵向变化，以及维持供应链稳定性的措施。来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威廉艾伦赖因施从美国的角度分析了目前供应链的情况，认为“美国国内政客关注的是选举投票。两党目前都对美国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在他看来，中美两国不太可能增进合作，共同稳定供应链和解决贸易问题。

除强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以外，很多发言嘉宾提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中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可以成为双边合作领域。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分析认为，在履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 2030 发展议程方面，“中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她同时强调两国未来再次合作能够产生的效果。

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认同这一观点，表示中国和美国都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她说：“不管我们的国家存在怎样的争议，我们必须携手合作。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客观地讲，这两个国家以及其它每个国家都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列举了中国和美国按照《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采取的合作。部分合作领域涉

及支持有效整合高占比、低成本、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减少电力浪费的能效政策和标准；以及，鼓励整合太阳能、储能和其他更接近电力使用端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分布式发电政策。

此次为期三天的论坛的最后一场讨论聚焦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各位发言嘉宾一致认为，虽然美国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面临挑战，但人文交流的潜在影响力不可低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原主席、中国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提到，人文交流曾在过去发挥重大作用。他同时介绍到，1971 年的“乒乓外交”结束了双边的敌对局面，最终促成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毛泽东主席会晤。

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认为，尽管当下中美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在部分领域两国仍然可以继续推动交流，如促进积极的商业往来和学生教育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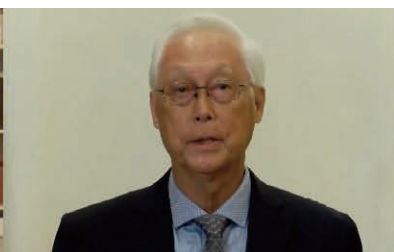
论坛结束时，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特约主编、论坛主持人周柳建成向各位与会人士传递了他的希望：三天会议期间分享的见解能够超越论坛本身。他总结认为，“提到价值观、思想和理念，它们不单单是听起来好听的话，本身也没有任何地缘政治战略属性。但它们真的非常重要，对每个人都有意义。”



Victor Fung 冯国经



Mary Robinson 玛丽·罗宾逊



Goh Chok Tong 吴作栋



Zeng Peiyan 曾培炎



Jacob Lew 雅各布·卢



Bi Jingquan 毕井泉



Qian Yingyi 钱颖一



William Fung 冯国纶



Charles Boustany 查尔斯·布斯坦尼



Craig Allen 克雷格·艾伦



Andrew Tung 董立均



David Lampton 大卫·兰普顿



Christine Loh 陆恭蕙



Jeffrey Sachs 杰佛瑞·萨克斯



Helen Clark 海伦·克拉克



Max Baucus 马克斯·鲍卡斯



Charles Foster 查尔斯·福斯特



Zhang Xinsheng 章新胜



Jean Chretien 让·克雷蒂安



Yasuo Fukuda 福田康夫



Steve Orlins 史蒂夫·欧伦斯



He Yafei 何亚非



Stephen Roach 斯蒂芬·罗奇



Lawrence Lau 刘遵义



Zhang Xiaoqiang 张晓强



Peter Wong 王冬胜



John Zhao 赵令欢



William Reinsch 威廉·艾伦·赖因施



Wang Yiming 王一鸣



Zheng Li 郑力



Xie Zhenhua 解振华



Liu Yanhua 刘燕华



James Chau 周柳建成



Chen Wenling 陈文玲



Wang Dong 王栋



# 中美关系的挑战与管控



# 合作的重要性



玛丽·罗宾逊 (Mary Robinson)  
元老会主席、爱尔兰前总统

**中美之间存在而且会不断地存在分歧。这是人类的典型特征，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世界需要中国与美国合作，将它们各自的优势整合、互补。**

此时此刻，全球对话与合作前所未有地重要，而中美之间良好关系是最重要的。

我们经历这场破坏性的全球疫情已近两年时间，它不仅暴露了全球疫情防范工作的失败，也暴露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架构中的诸多弱点。

无疑，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使我们更难在新冠疫情下协调可持续的复苏，更难应对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更广泛的生存挑战。

对于重建中美之间的信任，对于应对从疫情、气候危机到挥之不去的核冲突风险等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公开对话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一向高度评价与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行的公开而坦率的对话，包括我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华、以及最近一次作为“元老会”主席于2019年访问北京时与习主席对话。我多次访问美国也是一样，“元老会”去年在华盛顿就举行了两次理事会会议。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应该带头制定长期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

威胁。然而近年来，它们却总是卡在相互猜疑和对抗的状态里。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一项调查，8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做类似的中国民意调查也表明，中国人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上升，好感度（按1-10计算）从2019年6月的5.77下降到2020年5月的4.77。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然可以是有益而且有活力的，但如果它陷入民族主义式的挑衅，掩盖了共同的利益，那就不是这样了。两国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在青年、妇女、文化团体和其他群体之间建立联系。例如，2021年的天下女人国际论坛（Her Village International Forum）就将女性领导人聚集在一起，我还应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的邀请在论坛上发了言。

这次疫情提醒我们，我们的世界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它提醒我们面对生物多样性



## 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制定一个新的框架，来应对21世纪的生存威胁。

性改变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面对这个星球的界限被破坏，我们所有人究竟是有多么脆弱。

这些挑战与在传统上厘定外交政策的零和游戏范式格格不入，它需要持续不断的紧密合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最重要的是维护辩论自由和调查自由的权利，同时在公开和私下进行有挑战性的对话。只有通过这些有时很费力的交流，我们才能制定出有效且持久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成立了联合国，达成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些构成了现代多边体系的基石。

如1948年一样，《宣言》第一条开头的那句话在当下依然是适用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关于中美两国如何理解和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人权义务，我有很多话要说，但这不是我今天讲话的重点。

相反，我想强调的是，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制定一个新的框架，来应对21世纪的生存威胁。

去年11月，我参加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我很高兴地看到约翰·克里特使和解振华特使发表了美中两国声明。大会期间发表的这份“在21世纪20年代强

化气候行动”联合声明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要将峰会上的语言转化为具体行动，双方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在今年11月埃及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召开之前，它要拿出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近期目标。坦率说，2030年碳达峰已经太晚了。“气候行动追踪组织”认为，按照中国当前的气候计划，全球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3到4摄氏度。如我们所知，这将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可怕的影响。

提前碳达峰对实现巴黎目标和习主席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中国现在有一个关键的机遇，可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我希望中国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在可再生能源生产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过往成绩基础上再创佳绩。

美国也必须打破政治僵局，兑现已经做出的承诺，包括采取具体措施减少排放，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拖延已久的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方面，接受美国应出的合理份额。

中美合作对于确保实施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更宽泛的、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核心的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至关重要。



Mary Robinson 玛丽·罗宾逊

“

**世界需要中国与美国共同努力，将它们各自的优势整合、互补，为21世纪的治理、可持续和繁荣搭建起强有力的框架。**

“可持续发展目标”序言中的字句有力地阐明了这种共同努力背后的价值观，以及中国、美国和其他 190 多个联合国成员领导人在 2015 年承诺的义务：

**“我们决心让人类摆脱贫困和匮乏，治愈并保护我们的星球。我们决心大胆采取迫切需要的变革步骤，让世界走上可持续和有恢复力的道路。”**

与气候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样，这种对大胆变革的需要同样适用于全球和平与安全的辩论。

还是那句话，作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我当然欢迎本月早些时候五常国家的声明，它重申了里根-戈尔巴乔夫宣言，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即将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

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独特的领导范式：它是五核国中唯一在核武器问题上坚持“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国家。

如今，国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增加，加上技术的进步，一场破坏稳定的新核军备竞赛越来越有可能被触发。当此之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化解紧张局势的重要原则，我希望中国继续在这一领域展现领导力，特别是在限制本国核武库发展方面。

当然，美国最新《核态势评估报告》所总结的方式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进一步削减核军备和“降级”（de-escalation）。正如我的同事埃尔德·格罗·布伦特兰上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写的，“解决办法不是加倍押注在代价高昂的核军备竞赛上，而是通过寻求对话和军控谈判来遏制这一威胁”。

我们的世界面临大量的挑战，而近年来我们很难见到能担当未来任务的有道德有胆魄的领导人。

不过，我亲爱的朋友、“元老会”首任主席、已故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的话启发了我，我拒绝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和他一样，我也是“希望的囚徒”。我相信，我们可以集中集体的才能智慧，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分歧是存在的，将来依然会存在，但这是人类的典型特征，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

世界需要中国与美国共同努力，将它们各自的优势整合、互补，为 21 世纪的治理、可持续和繁荣搭建起强有力的框架。

“

**“我们决心让人类摆脱贫困和匮乏，治愈并保护我们的星球。我们决心大胆采取迫切需要的变革步骤，让世界走上可持续和有恢复力的道路。”**

# 超越分歧 走向合作



吴作栋 (Goh Chok Tong)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前总理

**地缘政治账簿上的主要赤字是战略上的互不信任。如果不能克服这一点，世界就会遭受希腊神话当中西西弗斯那样的惩罚，将充满争议的中美关系这块巨石永无休止地往山顶上推。**

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变的，是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重要性。我先谈谈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然后再建议如何以最佳方式继续往前走。

如果信任是这一领域的通货，那么，地缘政治账簿上的主要赤字就是中美之间在战略上互不信任。它源于价值观、意识形态、世界观、政治制度和对全球治理看法的差异。如果这种不信任无法克服，那么世界就会像希腊神话当中的西西弗斯一样被责难，就要将充满争议的中美关系这块巨石无休无止地往山顶上推。

美国认为中国，用拜登总统的话说，是“非常渴望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它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价值观的威胁。为此，美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并通过Quad和AUKUS等平台巩固了它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美国还吸引人们关注新疆和香港涉嫌

侵犯人权的问题，以及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谓胁迫行为。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尽管是主要受益者，但中国并没有遵循现有全球秩序规则，相反，中国正寻求改写这些规则，使之有利于自己。

往轻了说，中国认为这是美国的遏制战略，为的是阻止它崛起成为全球大国。往重了说，中国认为这是一种削弱并瓦解它的长期战略。它认为，美国“民主对抗专制”的

“

地缘政治账簿上的主要赤字就是中美之间在战略上互不信任。如果这种不信任无法克服，那么世界就会像希腊神话当中的西西弗斯一样被责难。



“

与其因为误判而冒让事态螺旋式升级和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不如设立类似美苏那样的21世纪“红色电话”。

设计意在破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类似的这样一场意识形态之争，曾经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中国领导层认为，过去外国势力剥削中国，是因为中国不够强大。中国领导人经常提醒人民，包括在中国共产党纪念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不要忘记中国的百年耻辱。为此，中国正在建设多种防御和进攻能力——在海上，在空中，在太空，以及通过网络战，而终极武器是核武器，“相互保证毁灭”威胁是最好的威慑。

中方的理由是，上述能力是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必需的。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军事建设带有进攻意图，尤其当它认为北京不愿参与全球核能力建设管控对话的时候。而对中国来说，反倒是美国应当削减其超强的核能力。

在最近双方的视频峰会上，拜登总统呼吁建立“常理性护栏”，习主席则将两国比

“

我建议美国和中国“避免因分歧而产生冲突，拥抱良性竞争，最大限度地合作”。

作两艘巨轮，必须共同前行，不能相撞。对两位领导人的话，当前的实际行动必须有所反映。中美两国必须认识到，维护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符合双方利益。在实现地缘政治野心的同时，两国必须在解决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时贯彻“要信任也要查证”共识。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曾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将是“在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基于这一框架，我建议美国和中国“避免因分歧而产生冲突，拥抱良性竞争，最大限度地合作”。

我最大的担心是台湾会不会成为一个开战的理由。我不认为大陆打算入侵台湾，想通过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然而，如果看不到和平统一的最终前景，它也可能认为自己别无选择。

北京在无数场合都重申，台湾独立是中国的红线。但最大的未知是，迫使大陆采取行动的转折点到底是什么。台湾获得的国际空间越多（北京认为这是美国暗中鼓励的结果），大陆对台湾施加的压力就越大。

考虑到误判的高风险，美国和中国确实应该商讨护栏问题，以避免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与其因为误判而冒让事态螺旋式升级和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不如设立类似美苏那样的21世纪“红色电话”。

不仅要避免冲突，中美还应以良性竞争为基础，通过尽可能的合作来推动两国关系。习主席说，“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拜登总统也示，美国将“要求中国遵守公平竞争、公平实践和公平贸易的国际规则”。表面上看，双方是有共同合作的基础的。

美国和中国必须依照国际法和现有国际规则秩序，解决究竟什么是良性竞争这个问题。有许多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和中国密切合作，这其中包括自由贸易、气候变化、全球疫情防范和宗教极端主义等。

除了两位主角，我们其他人能做什么？2019年以来，我一直在讲“温和的声音”，它代表着相关国家、领导人、机构、媒体、企业、智库和希望避免中美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各界人士，它提倡的是在相互依存、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下实现战略理性、和平、增长和繁荣。这种“温和的声音”应敦促美国和中国进行“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当然更不能是负和博弈。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希望中美之间有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关系。

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是通过接受分歧



来实现和平。东盟就是地理位置、历史、语言和政治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走到一起，共享“让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这一共同愿景的最好例子。

东盟可以是“温和的声音”，真实而独立。我们一贯鼓励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各个领域保持富有成效的参与。两国都是东盟的对话伙伴，我们希望在东盟最高级别会议上继续与中国和美国交流。

你们的这个论坛也是有意义的“温和的声音”。我希望，在中美交流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召开下一次论坛会议时，两个大国都能在处理战略不信任方面取得良好进展。这需要最高层的智慧和治国才能。我相信，拜登总统和习主席都拥有这些品质。我祈祷他们能在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之间建立战略信任。

“

这种“温和的声音”应敦促美国和中国进行“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当然更不能是负和博弈。

# 在问题中成长



让·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  
加拿大前总理

**这段艰难时光原本可能包括一场可怕的经济衰退。但相反，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在增长，财富一天一天地被创造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富，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并且将长期影响我们的，是中美关系。当然，它存在一些问题。

60年前我参与公共生活，我的一生都在关注辩论，都在阅读报纸杂志。我从没见过头版新闻会说这个世界运转良好，总是有问题、问题、问题。但当你回头看时，你就会看到我们取得的进步。

1945年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是什么？不高。当时非常困难。大家知道，51年前我就是加拿大政府中的一员。我们承认了中国，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在北美还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美国人接下来也这么做了，其他国家也一样。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非常非常强大的大国。这就必然会产生问题。

但当你环顾世界，你就会意识到我们共同取得的进步。例如今天，我们刚刚经历了两年的疫情，我们曾经担心它会给世界各地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很好地走出了困境。

以我们加拿大的情况为例，我们有哪些问题与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类似呢？我们有劳动力短缺问题。我这辈子都在谈如何解决加拿大的失业问题——这是好几代人的问题了。而现在最大的问题却是，我们找不到人来填补加拿大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空缺。

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情况都一样，贸易在增长，例如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就增长了，因为我们是近邻，我们有同类型的经济。去年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也有大幅增长。我们显然有很多政治问题，但贸易仍在继续。



Jean Chretien 让·克雷蒂安

“

美国人当然需要中国。中国需要美国、  
需要加拿大、需要欧洲，反过来也  
一样。

---

所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们能渡过这个极其困难的时期，它本来有可能是一场非常可怕的衰退，但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了增长。财富一天一天被创造出来。亚洲在增长，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财富，在30、40年前是不存在的，它让全世界的财富增加了。与过去相比，现在世界上有更多可用的钱了。

我们仍然面临严重的问题。但现实是，举例来说，与30、40、50年前相比，全球饥饿致死的人少了很多。人们接受教育，这曾经是一个大问题，但年年都在改善。像许多年前那种未接受教育的人在全球越来越少了。

对我来说，美国人当然需要中国。中国需要美国、需要加拿大、需要欧洲，反过来也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我们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总是有节奏的。问题也总是存在的。

我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一天不在去办公室时开玩笑。我说：“如果你给不了我好消息，也别给我坏消息。”因为新闻从来没有好消息，但我们已经设法解决了问题。重要的是，就像罗宾逊夫人说的，吴先生也说了，是对话！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50年前，我想我们会跨洲开个会议，互相交流见面。许许多多这类会议会让各国形

成这样一种心态：“让我们来寻找解决的办法。”

当然，核裁军问题自1945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保持均势也许能够确保没有人会使用核武器，因为使用核武器是非常愚蠢的。

气候变化是一个新挑战。但我关注到这个问题，并看到每个人都做出了承诺。永远不会完美，我们的目标也许无法顺利实现，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每个人都想朝这个方向前进。

在科学和新技术领域，机会日新月异。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我们必须保持对话。没有人想要战争，每个人都想创造财富。

对我来说，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如果我在世界上保持良好的平衡，我们就必须解决影响每个国家的问题：分享我们创造的财富。过去10年里的一个问题是，富人一天比一天富有，而穷人的财富却没有相应增加。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它就会给全球许多地方带来大量的内乱。

所以，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世界每个国家的内部都会出问题。而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让每个国家的人民分享到更多，就会有更多的幸福，而当人们感到幸福时，他们就会乐观。找出问题，就没有危险。

“

如果想在世界上保持良好的平衡，我们就  
必须解决影响每个国家的问题：分享我们  
创造的财富。

---

# 日本的前车之鉴



福田康夫 (Yasuo Fukuda)  
日本前首相

**日本在提振内需和制定贸易政策方面的不幸经验，今天仍可借鉴。希望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中美之间的一些摩擦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双方愿意相向而行。**

今年其实世界关注的课题还是中美关系，两国的对立和摩擦，导致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种不安的气氛之中。中美两国的关系，我不想用悲观的视角去看待。去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举行了视频会谈，在我看来，无论是拜登总统还是习近平主席，其实都是希望可以避免直接竞争。关于这一点，我相信两国的领导是具有相同的意见。

从美国来看，无论是南海问题，还是涉港涉台问题，他们想通过侵犯人权等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监视中国的发展。同时美国会要求其同盟国建立包围中国的包围网，同时也会煽动国际舆论，构建一种反中国的气氛。面对这样的背景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是“经济问题”，特别是“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贸易持续是贸易逆差，而中国是持续贸易顺差，这个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话题。其实日本也有惨痛的经历，其实日本也曾面临相同的问题，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在4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和美国之间也是贸易顺差和逆差的问题。

同样，德国也是如此，只是德国当时的贸易顺差没有日本规模那么大。非常有意思的是，德国和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经济上却处于国际上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地位。美国为了解决贸易逆差，1985年在纽约广场酒店召集了其他成员国，要求日本和德国大幅度提升汇率。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广场协议》，结果我们都知道，日元汇率大幅度提升，日本为了调整贸易顺差而提升了



日元汇率，以此来减少自己的对外出口。在那时候，日本也是希望可以和美国搞好关系，因此同意了《广场协议》，在《广场协议》之前1美元可以兑换240日元；到了第二年年底提升了70%左右，1美元可以换160日元；在两年之后1987年的年底，1美元已经可以兑换120日元；两年之间日元汇率提升了两倍。

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当然其结果导致日本的对外出口停滞，日本的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遇到了巨大的危机，日元汇率急升导致日本的经济长期停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多次降低利率，同时为了扩大内需，银行把剩余的资产和资金导向了不动产，之后产生了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的顶峰，纽约中心都被日本的资本家所占据，在那时候又导致美国国民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没有控制好经济的发展，导致美国的政府

“

35年前，日本的政策上到底有哪些失败？这些其实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以及美国的民间都产生了强烈的反日情绪。之后，为了缓解美国的反日情绪，当时美国正发动了海外战争，日本向美国提供了130亿美元（相当于1.5万亿日元）军费支持。

通过这些历史我们看到，其实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对于各个国家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从中长期来说我们当然要解决好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短期来说，可能我们要采取一些方式，比如说，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变得更为自由，但是金融经济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很难控制，比如像金融危机、雷曼兄弟的破产，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局势。

近几十年，中国变得更为强大，美国已经无法忽视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曾经也是无法忽视的，而今中国取代了日本的位置，美国意识到必须要控制中国的发展。35年前，日本是强行提升了自己的日元汇率，同时采取了扩大内需多种方式。很难说日本的经济获得了成功，不如说日本经济是陷落失败之中。那么，日本的政策上到底有哪些失败？这些其实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总的来说，首先提升汇率是可以的，但是短时间大幅度提升汇率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日元汇率一两年提升两倍过于强烈，对国内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觉得两年过短，其实用十年提升才是相对温和的一种提升方式。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挽救这一局势多次降息，却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展。让很多银行产生了很多不良债券，同时日本的很多商业银行倒闭，金融系统整体也不再健全，导致日本整体的产业政策进入到了一个长期的停滞状态。

整体看来，日本的经济政策还是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了日元

“

他们会找到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来对中国加以干涉。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国不要让步，把解决问题的所有精力放在贸易问题上就好。

---

汇率。因此，如何提升汇率以及如何做好扩大内需，这些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于缓解贸易摩擦也具有一定的效果。目前，中美两国最大的问题体现在贸易摩擦之中，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无论是扩大内需方面还是在贸易政策方面都可以借鉴。但是，也希望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我希望中美两国可以解决贸易摩擦，可以相向而行。

美国提出了解决贸易问题，但是同时会提出其他的观点，包括人权、民主等，他们会找到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来对中国加以干涉。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国不要让步，把解决问题的所有精力放在贸易

“

我们每个国家在世界的舞台上并非独舞，我们要和其他国家携手并肩，我们要考虑其他国家。中美两国的问题也是日本的问题。

---

问题上就好，中美两国之间可以进一步让贸易变得平衡，让经济流通变得更为顺畅。

的确，美国目前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对于现实问题会采取一些解决方案，同时也会强加自己的价值观。我希望各国还是基于自由、平等这样的立场去思考今后发展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来更好的未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这个地球变得更美丽，这一点也是我们由衷期望的。

我们每个国家在世界的舞台上并非独舞，我们要和其他国家携手并肩，我们要考虑其他国家。气候、水资源、贫穷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解决的，这些也关系到我们地球整体的发展。中美两国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两国，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中美两国的问题也是日本的问题，日本也要解决好如何处理好日美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贸易、经济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发展，因此日本不能不考虑必须要帮助中美两国解决问题，我们希望中美两国可以共同向前发展。

以上是我所想到的问题，希望日本和中美之间不要产生不协调的声音，我觉得那会给世界带来更不稳定的因素。

# 打破狂热的敌意



史蒂夫·欧伦斯 (Steve Orlins)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自称乐观的欧伦斯表示，中国和美国应该培养“合作习惯”，从关税、科学家、领事馆、记者和对国家安全的合理定义等问题入手，让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我想起了 50 年前的 1972 年。

大学毕业后，我乘飞机去了香港。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火车到落马洲，然后用我的双筒望远镜看边界另一侧的中国。当时美国人几乎进不了中国。7 年之后，我离开美国国务院，跨过了那道边界。但我想说的是，到现在已经 50 年了，而我已经离开香港两年，因为我被隔离。我想念那里的食物，我想念公司，我怀念那些讨论。我想念今晚在美国参加这次视频会议的很多朋友，希望有一天回去的时候我可以不被隔离，或者是少一些隔离。

去年 10 月，《外交事务》杂志采访了 68 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问他们美国的政策是否过于敌视中国。只有包括我在内的 5 个人强烈认为美国的政策过于敌对。我最初的反应是，虽然我是少数，但我的老朋友杰夫·贝德、李成博士和芮效俭大使也同意我的看法，这给了我很大安慰。

我记得，这不是我第一次对美国外交政策持少数派观点。作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我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反对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战争，看着我们的少数观点变成了美国人民的多数观点。多年后，我



“

真正威胁我们社会的是共同的威胁，是气候变化、经济危机、不稳定、恐怖主义，以及大家都知道的疫情。

反对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因为，作为一名前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律师（正如詹姆斯提到的），我认为入侵伊拉克违反了国际法。所以我是很乐意持少数派观点的。

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中，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我的观点不再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回想 2005 年 10 月全国委员会的年度晚宴，当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后来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了如今广为人知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演讲。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都从合作中受益。他呼吁中国作世界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他相信，接触将使中国有效地参与到世界体系中来。

上个月，我去百老汇看了《雷曼兄弟三部曲》，它讲的是我前雇主 154 年的历史。冯国经肯定知道这个故事，与会的很多人肯定也知道。我曾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掌管雷曼兄弟亚洲公司。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想起了美国和中国在 2007 年和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合作。虽然佐利克部长、我及其他一些人仍然相信这一点，但在今天这肯定是少数人的观点。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从 2009 年起，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地活动开始让华盛顿改变了态度。许多人问，这些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行为吗？多年后，仲裁庭对菲律宾仲裁案的裁决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大约在这个时候，中国还开始限制媒体进入，并给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和组织增添障碍。2009 年，Facebook、Twitter、YouTube 被屏蔽，2010 年谷歌被屏蔽，文化和社会交流的重要渠道被切断了。这也增加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不信任，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年轻一代。

从 2012 年开始，《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主要媒体也遭到封杀，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除了限制这些媒体，对研究的限制和拒绝向美国学者发放签证也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拒绝邀请美国科学家到武汉了解新冠疫情，更加深了不信任和怀疑。2017 年出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法律，也限制了民间交流的空间，扼杀了合作机会。据估计，2016 年约有 5000 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活动，截至去年 12 月，只剩大约 600 家在中国政府注册了。这



“

我们需要培养我所说的合作习惯。我们需要就国家安全的定义达成一致，以免它变得过于宽泛，导致我们无法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做生意。

不仅是这些组织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的巨大损失。

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政府没有犯错。这些错误对两国关系同样是毁灭性的。我可以列举出来，只列举其中一些：逮捕孟晚舟；发动关税战；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启动后来源自美国司法部的“中国倡议”；在美国限制中国的国有媒体；在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方面挑战极限；增加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减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中国的人员；关闭在休斯敦的领事馆；对实体清单过度使用，而且透明度很低，同时制定军事清单禁止与中国公司做生意；摘牌；终止富布赖特项目，撤走在中国的“和平队”；拒绝给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发放签证；在中国干涉美国大选问题上撒谎。

你们可能以为，由于两国政府都存在这些问题，我会持悲观态度。但我不是。我不是，因为从根本上说，我相信美中两

国人民都认识到，真正威胁我们社会的是共同的威胁，就如今晚这里多次提到的，是气候变化、经济危机、不稳定、恐怖主义，以及大家都知道的疫情。但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也就是我们今晚听到的，是很多关系到全局的问题。

我笃信，我们需要培养我所说的合作习惯。我们需要在短期内培养它们。冯国经提到，应当停止2017年1月20日开征的关税。我们必须这么做，现在就需要。我们需要就国家安全的定义达成一致，以免它变得过于宽泛，导致我们无法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做生意。我们需要重启科技和医疗合作。我们需要重开在休斯敦和成都的领事馆。我们需要重申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我们需要重新让更多美国记者进入中国，以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可以列出许多我们今晚应该做的事，现在应该做的事，但我的时间不够了。

不过正如我所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同意习主席的看法：没有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我开头说了，正如我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从少数变成多数，我相信，希望中美关系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人也会再次成为多数。这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

没有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曾培炎

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走向未来的关键，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如此。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竞争早该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通胀和金融风险压力加大，新冠疫情反复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近年来遭遇了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偏离了正确航向。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两国都很重要，也是世界各国的期待。

“

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中国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去年11月16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首次视频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沟通与交流。习近平主席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的三点原则：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认为这三点原则非常重要，给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就这个问题，我想分享几点认识：

**——相互尊重，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前提。**要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世界是多彩和多元的，中美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两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决定的。中国无意改变美国，美国也不可能强制改

“

## 和平共处，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 底线。

变中国，应该鼓励各国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要尊重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务必谨慎处理，不逾越底线，不制造麻烦；要尊重各自发展权利，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中国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相互尊重，意味着在相处中平等相待。美总是以“从实力的角度”与他国对话，这是典型的霸权思维，这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做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早就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应该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和平共处，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兼爱非攻。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美国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满足国内部分利益团体的需要，将

中国树立为假想敌，这最终可能导致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和平共处，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中美存在一些分歧很正常，关键要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建设性管控，避免分歧扩大化、激烈化。要加强各领域各层级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避免战略误判。

——**合作共赢，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目标。**随着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素资源实现了大规模跨境流动。国与国的关系中，互利互惠取代零和博弈。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彼此依赖，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当携手探寻合作共赢之路，顺应时代潮流，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中美在双边及全球事务中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应加强重点领域合作，将合作潜力转化为发展动力。

**一是加强抗疫合作。**新冠病毒变异和快速传播严重威胁各国民众生命安全，这





世纪疫情再次表明，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唯一可行方案。

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中美两国在世卫组织引领下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疫苗和药物研发、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数据共享水平、提升疫苗国际分配的公平性、协调跨境旅行国际协议，使世界尽早从疫情中走出来。

**二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经过共同努力，去年双方先后发表《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和《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为深化两国气候领域合作奠定重要基础。中美碳排放之和超过全球总量的四成，应携手加强气候行动与合作，加速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创新，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

**三是加强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尽管受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2020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美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8.7%，充分表明中美经贸关系相互嵌入、互为支撑，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潜力。中国正在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工商界创造更大发展机遇。

**四是加强科技合作。**近年来，美国政

府一些人将科技问题政治化，人为在科技领域“建墙”、“脱钩”、“断供”，给两国企业研发创新带来了不利影响。据美国媒体调查，60%美国受访者支持与中国科技公司开展密切合作。希望美方正确看待，“打开小院、拆除高墙”，停止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无理打压和限制，共同推动人类科技进步发展。

**五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世纪疫情再次表明，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唯一可行方案。中美应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世界银行、IMF、WTO为重要支柱的全球多边体系，充分发挥G20平台等多边组织的作用，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是中美两国相处应当坚持的原则，对世界各国相处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有担当，做表率。我相信，只要秉持并践行这三个原则，就能推动中美关系沿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 全球经济复苏



# 前方的道路将颠簸不平？



雅各布·卢 (Jacob Lew)  
美国前财政部长

**中国对新冠疫情的零容忍态度在世界范围内非常亮眼，其经济后果将在未来几周显现。在美国，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断增加，但美联储应谨慎应对，以避免引发经济衰退。**

我们进入 2022 年的时候，面对着相似的形势。疫情和复苏可能影响未来一年的经济状况；政策制定者有可能面临充满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一年。全球经济在增长，尽管速度比此前预测的慢一些。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随着健康状况不断改善，有迹象表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在从疫情中缓慢复苏。同时，正如我们去年年底在德国看到的那样，疫情反复爆发，仍然可能导致经济放缓甚至负增长。随着世界不断适应疫情下的现实生活，这些问题持续的时间似乎越来越短。当然，这同样取决于疫情发展。

中国的零容忍政策非常亮眼。由于供应链和生产中断引发新的不利因素，我们将在

“

**2022年，如果美国的刺激措施结束，消费者不再更换疫情购买期间的许多产品，挑战就会出现。**

未来几周看到这一政策造成的经济后果有多严重。最近公布的去年第四季度增长数据较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也有所松动，都反映了这种疲弱的增长态势。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疫情政策措施没有大力鼓励消费者消费，所以 2021 年的增长依赖不断加速的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扩张和出口增长。

但很难看到这种出口增长能够长期持续。中国受益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复苏刺激措施，尤其是美国的。面对全球供应受限和价格上涨，这些刺激措施鼓励消费者消费。所以，即使出口量下降，出口额不断上升。

2022 年，如果美国的刺激措施结束，消费者不再更换疫情购买期间的许多产品，挑战就会出现。同时，其他供应渠道将开始恢复正常。对香港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和大陆的贸易往来能否填补零容忍政策损失的国际活动。

如果 2022 年的出口表现不理想（至少美国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将关注汇率以及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是否受

“

**美联储拥有强有力的工具摆脱疫情影响，但面对措施过度和引发经济衰退的风险，他们确实应该谨慎地制定决策。**

到人为管理以刺激出口。任何管理人民币汇率从而获得优势的迹象，都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摩擦。

此前的很长时间内，美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地帮助美国经济度过疫情危机，实现迅速恢复。现在，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断上升。美联储表示，货币政策将在不久之后收紧。同时，即使美联储的加息速度超过预期，各种信号仍然清楚地表明，他们将非常谨慎，高度关注宏观经济条件，努力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引发经济衰退。

我非常重视他们基于经济状况变化，提高或降低利率以及实施量化宽松的意愿。我们知道，即使规模缩减的《Build Back Better》法案获得通过，美国的财政刺激措施也将开始结束，因为这些措施是有成本的，而且最初几年也只实行了少量刺激政策。未来，信贷条件可能收紧，刺激措施会减少，但各种预测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继续增长。

虽然这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但存在一种值得关注的风险：紧缩货币政策和结束财政刺激是否过火？美联储拥有强有力的工具摆脱疫情影响，但面对措施过度和引发经济衰退的风险，他们确实应该谨慎地制定决策。

随着对通货膨胀的关注日益增多，人们的讨论一直狭隘地局限于此次通货膨胀是短

暂还是永久存在。实际上，二者可能兼而有之。随着劳动者全面回归工作，供应链恢复正常，大部分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减少。只不过因为疫情反复，这一过程需要的时间比预期的要久。同时，虽然商品价格有可能快速调整，但工资等其他成本往往不会变化。这并不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因为低端工作的工资增长能减少收入不平等。但要实现这一点，整体价格的增长应该适度，否则实际购买力会受到削弱。

大部分接种疫苗的地区可能接受疫情的变化：从全球疫情演变到地方传染病，直到全世界都接种疫苗。即便如此，在增长缓慢和未接种疫苗的地区，新病毒变种和疫情爆发的风险仍然很高。金融压力的风险也非常高。最贫穷国家的疫苗接种和复苏的速度较慢。世界银行预测，到2024年或2025年才能恢复疫情之前的就业水平。疫情期间，这些国家的债务上升，金融压力也越来越沉重，因为最低收入的经济体复苏速度落后于发达国家。此外，美国结束疫情期间实行的货币政策，将提高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偿还成本。我们预计，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将需要重组自身国际债务，但它们所处的债务重组环境已经非常不同于过去。中国成为主要的双边贷款国，也没有接受巴黎俱乐部的贷款，所以需要参与到管理债务减免的国际对话。

“

**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断上升。美联储表示，货币政策将在不久之后收紧。**



“

这种情况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和中国重归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接触与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除非国际贷款国，包括双边和多边贷款国，看到中国全面参与债务重组，否则它们犹豫不决的行动可能破坏有效和及时的反应，而这只会增加危机的风险。这是中国挺身而出的机会，与美国等其他主要贷款国展开双边合作，并通过国际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去年在 G20 会议上的讨论是良好的开端。但未来仍然挑战重重，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充分参与。

为了减少美中关系的压力（这种压力本身无助于全球经

济复苏），可以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寻找合作机会，特别是此前提到的跨国问题，因为健康状况影响到经济前景。加强科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将是不错的起点。但双方也需要愿意强调在减少紧张局势方面的进展，哪怕进展不太显著。在格拉斯哥，两国在协调决策方面迈出了一小步。而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石油以解决全球供应短缺的联合决定，显示出两国一定程度的合作。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似乎都没有兴趣关注这种进展

—— 这令人感到遗憾，因为即便小小的举动也有助于重建信任。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问题上，石油价格能够引发强烈的情绪以及美国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但两国没有抓住机会，展示双边合作对日常生活，特别是劳动者生活的积极影响。

放眼未来，限制全球供应链效率的关税和政策提升了通货膨胀持续的风险。有效的气候政策，无论是碳定价还是更昂贵的传统技术替代品，都有可能加重通胀压力。这种情况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和中国重归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接触与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从而促进每个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在人权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上，美中存在着深刻分歧。美国认为，这些问题是无法忽视的。同时，我们推动符合自身标准和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的同时，在只有通过美中合作才能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取得有效成果的事务上，还需要保持接触。



# 建立更持续、更包容的经济复苏



毕井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大国，两国合作对两国和世界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加强各层次的交流与对话，在几个关键领域采取具体行动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一年，中美两国经济都在恢复，共同引领了世界经济。随着新冠疫苗全球范围接种扩大，刺激货币政策的实施，世界经济逐渐走出了衰退的阴霾。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5.9%，中国经济增长8.1%，美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6%。但是，这种增长是在2020年萎缩或低增长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是主要经济体扩张性宽松经济政策刺激下的增长，因此基础是不稳固的。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是全球疫情的形势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冠病毒株频繁变异，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难以估计。二是全球通胀压力上升，

能源、大宗原材料、海运费价格上涨，物价总水平攀升，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挑战，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可能转向引发全球的关注。三是供应链瓶颈持续凸显，多国出现生产中断、运力紧张收货延迟的现象，许多产品原材料正常的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四是债务风险加大，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大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随着利率的上升和复苏的放缓，债务可持续性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增加。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贸易、人员深度融合，中美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中美要按照不久前两国元首视频会晤达成的共识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各层面的交流对话，为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加强宏观政策的沟通协调。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有所放缓，各主要经济体应该重视国内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利用G20双边合作等平台，加强宏观政策的沟通协调，避免出现全球资本走向逆转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2、妥善处理贸易战加征的高关税。特朗普遗留下来的不公正的对华经贸政策，严重影响中美经贸合作，影响两国经济增长，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应该尽快予以改变。希望美方顺应业界的呼声，取消对中国贸易投资的人为限制和障碍，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的正常化。

3、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了覆盖

“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有所放缓，各主要经济体应该重视国内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利用G20双边合作等平台，加强宏观政策的沟通协调，避免出现全球资本走向逆转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众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提升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应当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完整，避免把经济问题政治化，避免泛化国家安全，及时解决双方矛盾中的问题，共同推动多边贸易投资体

系改革，共同推动全球贸易投资秩序。

4、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美要把双方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建立更可持续、更可包容的经济复苏。



# 全球重置



何亚非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全球化不会终结，但供应链会呈现新的形态。因此，尽管有理由担心冲突，但也不必绝望。动荡终会平息，水面将恢复平静。只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就会找到消弭分歧的办法。**

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过去尚未成为历史，未来已经到来。全球动荡有增无减，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地缘政治纷争加剧，科技革命、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问题来势汹汹，给人类带来多重生存危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困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下列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

我相信全球化不会终结，相反，它将适应快速的变化，并通过再全球化进入全球化2.0。

正如许多发言者提到的，**首先是难以消除的疫情，它颠覆了我们熟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尤其是它阻碍了全球的人员和货物流动。拿国际旅游来说，2021年，国际游客数量比前一年下降80%以上，导致全球相关收入减少4.4万亿美元。

疫情对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交流的负面影响是如此深远和持久，我相信更显示国际社会需要团结。疫情在国家之间造成分裂，使全球公共卫生系统更加支离破碎，并暴露了南北经济差距，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完全恢复。

**其次，去全球化的势头将重塑全球供应链。**雅各布·卢也提到了这一点。它通过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影响着每一个经济体，让“创造性破坏”得以发力。

“

无论是合作还是脱钩，技术竞争都会是未来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大国互动的主战场。

我相信全球化不会终结，相反，它将适应快速的变化，并通过再全球化进入全球化 2.0。当我们说再全球化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键产品的全球供应链将发生改变和调整，因为人们会通过自我感知的、新定义的国家安全透镜来看待这些产品。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甚至一些非常重要的国内外供应商已经被取代。如今供应链正向本国靠拢，或者完全转移回本国。在芯片、医药、稀土、5G 基础设施等信息设备领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正如经济学家论述的，无论何时何地出现危机和新的革命性技术，都会有“创造性破坏”发生。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经历前所未有变革的历史性时刻，这两样都存在。

创造性是否由创新推动，创业精神能否超越破坏，还是相反，目前尚不清楚。我们得等等再看。此外，许多发言者提到了金融风险、通货膨胀压力等。其原因是多阶段的量化宽松，以及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的负利率政策。这些政策累积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至于另一场全球金融危

机近在眼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随着美联储即将开始缩表和加息，全球资本流动和汇率再次波动，大幅波动，这使一些依赖国际资本和资本流入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大的资本流出和偿债压力。

**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当然这是一场以创新为动力的技术革命。**无论是合作还是脱钩，技术竞争都会是未来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大国互动的主战场。

我相信，信息时代很快会让物联网成为现实，产业数字化和数据本身就是一个行业。把世界经济推向我们所期待的新高度的，不是别的，而是智能制造，规模化工业生产将转化为充分利用实体网络、虚拟网络和技术的智能生产。在这里，技术革命将与信息革命无缝融合，创造出全新的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第四，地缘政治。**地缘政治角力与争夺由大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驱动。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正在见证一些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

随着美联储即将开始缩表和加息，全球资本流动和汇率再次波动，大幅波动。



人为脱钩，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这种脱钩更多是基于意识形态站队，而非其他。这非常不幸，因为它会破坏而不是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是悲哀的现实，而我们不得不忍受。

我们现在谈的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大家都知道，中美两国的 GDP 之和占到全球的 40% 以上。但为什么会是现在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呢？长话短说，我认为，美国越来越担心并专注于中国对其世界霸权的挑战。这是由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解和误读——历史证明，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道路。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这方面说的很明白。

我们都知道，“合则存，分则亡”。关于这一点，欧文斯先生在演讲中说了很多。这同样适用于中美经济关系，也适用于未来的全球经济。

一些专家说，中美之间正发生“新冷战”。曼尼什·夏尔马 (Manish Sharma)

教授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一些人。但我相信现实并非如此，只是我们双边关系的演化面临太多风险。

更实际地说，对于两国在各领域是如何相处的，较准确的描述应是“走一步看一步”。我认为，两国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尽可能多地在全球贸易、投资、金融、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核不扩散等领域开展合作。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而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地缘政治竞争蒙住了双眼。

最后我想展望一下全球经济的未来。正如我提到的，我们有理由担心，但也不必绝望，因为希望在于，只要我们辛勤工作，共同努力，所有令人担忧的事态引起的动荡终会平息，水面将恢复平静。我强调“共同”，是中国和美国，通过解决分歧来实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摒弃分歧，进行合作和谈判，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国和整个世界。

“

全球经济正在见证一些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为脱钩，特别是在技术领域。

# 增长、通胀和政策的十字路口



斯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在评估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前景时，这位顶级经济学家强调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的看法发人深醒。**

我的讲话将集中在全球经济复苏上。我想强调三个问题，显然它们对评估未来几年世界前景至关重要——增长、通货膨胀和政策。

首先是经济增长。新冠病毒出现一个接一个变种，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这种变化就是所说的疫情“回音效应”的例子，从一个变种转到另一个变种。我相信，这场疫情的回音效应很快就会反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回音效应中。我们在2020年初的那种封锁已经结束了，而这也意味着，封锁结束后快速反弹的活力也消失了。但问题是，只要疫苗民族主义继续存在，整个世界就没有免疫，就像今天的情况，更多的变种还有可能出现。奥密克戎也许不会结束，疫情还将继续，我们现在经历的回音效应很可能也会持续下去。所以我对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增长的结论是，它将是失衡的，全球经济会在强弱之间摇摆。

第二是通货膨胀。没有那么复杂，它是供求问题。在我看来，供应方总会发生意外。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价值链的世界，本次会议明天的一个小组讨论将涉及这个问题。而我对全球供应链的看法是，它们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灵活。要将物资和零部件从一个目的地快速迁移到另一目的地，这是非常困难的。冯国经就是世界级的供应链专家。我的看法是，供应链的惯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近两年前，我曾经就这一问题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认为它是滞胀的潜在来源。

“

**只要疫苗民族主义继续存在，整个世界就没有免疫，增长将是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会在强弱之间摇摆。**

但通胀的真正问题在需求方。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美国，他们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火上浇油。他们注入大量的顺周期政策性刺激，推动总需求在解除封锁后空前反弹。所以，疫情冲击最严重时期一度出现的供需失衡很快就消失了。现在总需求远远高于总供给，这就产生了通货膨胀问题。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这个问题上误判了，他们称之为暂时的，现在他们不说暂时了，他们承认犯了错误。凭我这把年纪，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上世纪70年代，我从学校毕业后，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我们曾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美联储主席，我为他工作，他的名字是阿瑟·伯恩斯，他也曾经把70年代大通胀的早期迹象称为暂时的。他错了，就像他今天的同职位者一样。阿瑟·伯恩斯的记忆还困扰着我呢。

通胀会从当前的峰值回落，但在未来几年的任何时候都不太可能回到疫情前不到2%的水平。

第三个问题是政策。人们说，货币政策落后于曲线，他们的意思是落后于收益曲线。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想说的是，货币政策是低于总需求曲线的，政策导致总需求水平远远高于总供给曲线，即使总需求的增速已经放缓（目前看来是这样），但水平仍

“

金融市场正进入一个巨大的风险期，这中间包括股票，尤其是债券，也包括美元。



然过高。这就是为什么高于目标的通胀会持续存在的原因。这对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

看看现在的美国。我们的消费物价指数通胀率同比上升了7%。我们的基准联邦基金政策利率是零，这意味着按通胀调整，实际联邦基金利率是负7%。之前最差是1975年的负5%，1980年也是负5%，这足以让我们在那段时间经历可怕的通货膨胀。况且，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比当时更接近负值。

所以我们来算一算，即使美联储今年加息三到四次，通胀年内从7%降到4%（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仍然有争议），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到年终的时候仍将是负3%。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过度货币刺激。所以我要再说一遍，货币政策不是落后于收益率曲线，而是低于需求曲线。

最后，我说过要给大家讲三个问题，但我还要给你们讲第四个问题。它很简短，就是市场。市场已经意识到美联储必须收紧政策。呵呵，谁不知道呢，这是明摆着的。但市场，显然还有美联储，它们都不知道要在多大程度上收紧政策，才能让目前实施的、并将持续到年底的非常规货币刺激结束。所以金融市场正进入一个巨大的风险期，这中间包括股票，尤其是债券，也包括美元。



# 竞争会持续下去



刘遵义 (Lawrence Lau)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国际关系状况最终会好转，但也可能先变得更糟。对中国来说，好消息是私营部门将继续繁荣，让它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我们有足够的乐观空间。**

我会重点谈谈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我想，首先，正如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宣布的，中国将奉行一种双循环发展战略，既有国内循环，也有国际循环，但以国内循环为主。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型大陆经济体来说，这是可以想见的。

我给你们看张图表，它展示了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之比。红线是中国，蓝线是美国。大家可以看到，在1980年之前，中国的比例很低，但现在上升到了大约70%。它不会下降。美国一直很低，不是很高。

我认为，中国看来正在迅速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

习近平主席还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碳达峰，并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两者实际上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影响。我还想说的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同富裕”并不等于简单的再分配，它通常的意思是给那些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一个致富的机会。新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表明，政府允许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的私营部门成长繁荣。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如许多演讲者之前谈到的那样，可能会成为未来10年左右的一种新常态。原因很简单：作为全球霸主，美国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对它说“不”，而且不受惩罚，因为这将鼓励其他国家也说“不”，这会让美国很快失去全球霸权。所以，我认为眼下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除非美国确信他们已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事情最终会好转，但也可能先变得更糟。

尽管如此，如果大家看看中美贸易情况，虽然过去一两年双方互征的关税还在，但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额在2021年达到7550亿美元新高，增长了28.7%。这是根

据中方的数据。上面这条曲线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面的曲线是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只是货物贸易，如果把服务业算进去，顺差看起来就没那么大了，因为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顺差。如果看美方的数据，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为什么美方数据显示的中国出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可能会成为未来10年左右的一种新常态。

##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和预计增长率

全球	2019	2020	2021	2022	203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110)		-3.1	5.9	4.9	3.3
世界银行 (2201)	2.6	-3.4	5.5	4.1	3.2
中国 (大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110)		2.3	8.0	5.6	
世界银行 (2201)	6.0	2.2	8.0	5.1	5.3
美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110)		-4.5	5.2	4.5	
世界银行 (2201)	2.3	-4.6	5.0	3.8	2.3

口下降，幅度要比中方数据大得多。但事实摆在那里，显然，这些关税并没有真正减少中美贸易。

接下来我想谈谈可能的脱钩。我认为，脱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在技术领域看到了。但我认为，虽然脱钩本身会导致一些过渡性问题和混乱，可是，一旦找到第二货源，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控制就没用了。所以需要第二货源，到那时，出口控制实际上是进行不下去的。

美元开具发票、进行清算和结算的全球主导地位也将逐渐下降，因为大家会更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来做这些事。例如，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就普遍用它们的本币结算。再比如，中国和印尼的贸易也以人民币和印尼盾结算。我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

我展示的这张图显示了IMF和世界银行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预测。它们没有太大的区别。去年，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8.1%，美国的数据还没公布，但我想应该在4.5%到5%之间。2022年，预计中国的增长目标设在5%到6%。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如果看季度数据，你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恢复得非常好。上季度的情况不太好，原因是疫情卷土重来造成了一些瓶颈，还有一些能源或电力短缺问题。但我认为今年应该没有问题，我想中国能实现5%到6%的增长。

至于美国2022年及以后，我认为，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在4%上下，然后在这个10年剩余的时间里逐步下降到3%。



实际上，我已经对中美两国经济做了一定的长期预测，我的预测是，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届时两国经济规模都在30万亿美元左右。然而，即使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也不到美国人均GDP的30%。这种状况将持续几十年，直至本世纪末。

我还想说一件事。我再给你们看最后一张图表。可能有人怀疑，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5%到6%的增长？我认为这在未来10年是有可能的。这张图展示了以下内容，我们分别标出了经济增长率与实际人均GDP，红点代表中国，黄点代表日本，蓝点代表美国。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人均GDP略高于1万美元，而美国远远不止，人均将近7万美元，日本在中间。希望大家注意的是，中国经济仍然是在增长率可以很高的这个区间内运行，你们可以看到，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2万美元甚至3万美元时，经济增长率（从美日两国的经验看）依然能够达到6%左右。所以长期看，我还是相当乐观的。

# 中美相悖的宏观政策 将增加 2022 年的不确定性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

**我们只有有限的能力来理解中美两国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或预测它们在未来一年的结果。要寻找有价值的线索，请密切关注 2021 年政策及其效果。**

“

我们的认知是很有限的。

全球经济复苏，非常关键的，取决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经济体的表现。刚才大家都做了很好的分享，都同意 2022 年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的关注点当然是 2022 年。不过我想说，不确定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对经济的判断以及对经济政策后果的判断，我们认知的有限性是我们需要在年初就给予重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觉得我们可以从 2021 年的经历中吸取很多的教训。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对经济有很多判断。现在回过头来看，里面有一些是不

那么准确的，实际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在疫情方面，去年年初当然不可能准确的预测，也没有想到德尔塔（Delta）更没有想到奥密克戎（Omicron），也没有想到对供应链的冲击和全球贸易的影响，以及对疫苗的有效性。我们的认知是很有限的。

更重要的，还是对经济走势以及政策后果的判断。比如美国的经济，一年前的时候没有人讨论通货膨胀的问题，一年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美国的劳动力市场

“

全球经济复苏，非常关键的，取决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经济体的表现。



应该说表现很不错，但是通货膨胀达到了 39 年以来的最高，而且会比想象的持续时间更长。与此相关的是消费者信心指数目前是疫情以来最低。这些都是之前没有很好判断的。事后看，可能美国的刺激政策力度过大了。其实当时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说过刺激力度是不是过大了，要考虑到乘数效应。但是这个意见没有成为主流的意见。其实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中国经济情况也是有一些没有想到。现在数字已经出来了，2021 年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 21%，而投资的贡献只有 14%，也就是说，出口远远高于预期，投资低于预期，这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对经济，特别是政策效果的认知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一种谦逊的态度来看，这样很多事情可能就会有所准备。

2022 年有很多不确定性。我觉得刚才各位说了很多我都赞同，特别谈了很多是关于贸易、关于供应链等等。但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是跟政策的后果相关的。当然，疫情仍然有很大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 Omicron 是不是最后一个最严重的变种，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疫情会以什么形式结束。当然这个也是跟

疫苗的有效性以及是不是有特效药都相关，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在政策方面，我想说越来越重要的是宏观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中国和美国，现在都已经宣布了非常强烈的宏观调控意图。美联储非常清晰地表明要加快缩表并加快提高利率，现在美国的失业率是接近 4%，几乎接近疫情前了，而核心通货膨胀率超过 4%，在消费者信心比较低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被市场能接受的政策。中国正好相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调低利率，尽管刚开始很小，但是昨天央行声明要三种发力，充分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就是非常明确的是一个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对应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现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这两种相反的宏观政策，它们的合力的后果将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方面具体的沟通、协调我觉得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现在非常有限。这不仅仅会影响中美两国的经济，而且因为中美两国经济对世界影响之大，会直接影响到全球资本流动、资本市场等。所以这恐怕是在 2022 年初就应该非常值得关注的。

“

现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这两种相反的宏观政策，它们的合力的后果将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 贸易与投资



# 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交织



查尔斯·布斯坦尼 (Charles Boustany)

美国联邦前众议员

**当接触中断时，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平衡就会变成解决争端的手段。这对和平的关系构成广泛威胁，并给世界带来风险。所以说，风险真的很大。**

对于美国和中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一样，国际贸易和投资与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都是密切相关的。这意味着，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很重要，同时它也对国际政治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广泛的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它已经上升到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水平。

我同意，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最终世界和平关系的可持久调整，取决于我们这个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大国在贸易、投资、技术的规则、规范、标准方面缺乏共识，交往上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情况。接触中断，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平衡就会变成解决争端的手段，这将造就一个充满威胁和冲突的环境。无疑它让和平的关系面临危险。

“

**接触中断，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平衡就会变成解决争端的手段，这将造就一个充满威胁和冲突的环境。**

“

**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很重要，同时它也对国际政治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广泛的影响。**

所以在我看来，风险真的很大。挑战是严峻的，而且与日俱增。在多个经济领域，脱离接触或脱钩正在升级，这导致供应链断裂。这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可以说，甚至在特朗普当政之前就开始了，但肯定是在特朗普当政期间升级的。这种中断由于疫情导致大环境被破坏而恶化了。

现在，通货膨胀正在上升，这对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问题。保护主义的兴起，变成挑衅性地把经济方略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是经济和政治胁迫的工具。

我得说，在美国，人们对中国的贸易和商业做法普遍感到失望。这是相当普遍的，而且有增无减。这种失望情绪源于中国持续指导或纵容国家补贴、窃取知识产权、以各种形式强制技术转让、为商业利益搞网络入

“

“局部脱离”正在不断深化，这将导致国际关系中权力平衡的不稳定。

侵、限制市场准入、在许多情况下缺乏透明度，以及人们担忧中国是否履行入世承诺。

美国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没有提供改革的途径，便阻止了WTO上诉机构的运作。美国单方面对诸多商品征收301条款关税，并实施投资审查和制裁。所有这些都是为进一步脱钩。实质性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和所谓“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是一个以301条款关税作为执行机制的管理采购协议）的崩溃，导致了进一步的不信任和僵局，而脱钩仍在继续。

因此问题是，太平洋两岸负责任的领导人应当如何处理已经生成的战略不信任？

首先要认识到，我刚才所说的战略不信任，是在新技术推动两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虽然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但中国经济自从它入世以来仍是部分封闭的，双方在规则、规范和标准上的共识不能让人十分满意，而WTO执法一直无效。如今美国的应对办法就是采取措施，部分脱离接触或脱钩。

其次要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是无法与战略考量分开的，这就增加了风险。

第三，中美之间的竞争是长期存在的现实，我们必须学习，必须找到有效管理这种竞争的方法。

第四，“局部脱离”正在不断深化，这将导致国际关系中权力平衡的不稳定。

第五，两国领导人义务就交往规则寻求最广泛的共识。我的看法是，要想良性竞争，如果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就是领导力的失败。

如果扩大在规范、规则 and 标准方面的共识，如果在贸易、投资和技术使用标准上开始趋同，并达成执行协议，那么，脱离接触或脱钩就会减少。要是没有形成共识，脱离接触或脱钩就会加深。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困境。

竞争可以以规则为基础，按规则进行。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希望中美之间良性竞争，而这取决于在较高冲突风险下的力量平衡。



“

如果扩大在规范、规则 and 标准方面的共识，如果在贸易、投资和技术使用标准上开始趋同，并达成执行协议，那么，脱离接触或脱钩就会减少。



# 进一步推进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



张晓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执行局主任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摩擦，但总体贸易一直在蓬勃发展。现在应该在此基础上，纠正两国双边投资规则的不平衡，加强数字经济合作。**

我针对中美贸易和投资谈一些个人看法。

## 一、中美贸易仍在增长

在世纪疫情严重冲击下，双方努力克服供应链受阻等不利影响，实现了双边贸易的强劲增长。据中方统计，2021年，中美贸易额达7556亿美元，同比增长28.7%；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795亿美元，同比增长32.7%。以中国自美国进口能源产品为例，在2020年初中美达成一阶段经贸协定的框架下，当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达2000万吨，比上年增长221%，2021年1-10月进口约1300万吨，保持在较高水平。自美国进口的LNG 2020年为321万吨，2021年1-10月高达732万吨，美国已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中国第二大LNG进口来源国，两国能源贸易有良好前景。

应指出的是，由于美方挑起贸易摩擦，采取额外增收高关税的举措，使得一些中国企业对美出口遇到困难。但据多家美国研究

机构、商会的研究，增加的关税约90%是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负担。这几个月美国CPI逐渐增高，去年12月同比上涨7%，创近40年来的最高纪录。造成美国高通胀有多个因素，包括美联储这两年采取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等。但滥用高关税肯定是“火上加油”，“损人害己”。

## 二、双边投资严重失衡

中国大力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逐年缩短，营商环境不断改善。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投资达173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一批

“

美国已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中国第二大LNG进口来源国。



美国金融机构去年获得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新突破。美国特斯拉公司去年向全球市场交付了近94万辆新能源汽车，比上年增长87%，其中在华销售达32万辆，占全球份额34%。能实现快速增长，既有全球特别是中国市场所提供的巨大空间，也是由于特斯拉上海工厂充分发挥了在华生产的比较优势。上海厂去年交付超48万辆，占特斯拉公司总产量的52%。

这些事实显示了中国的门确实是越开越大。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虽有积极性，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歧视性政策，滥用“国家安全”措施，使大批中国企业难以赴美投资；已在美投资的企业常常受到不公平待遇，一些公司在美国的营业执照被无理取消，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不得不撤市回归。希望美方能够采取切实措施取消对中国企业投资活动的无理打压，改善营商环境。

### 三、扩大贸易促进投资的相关建议

双方应落实两国元首在去年11月视频对话中达成的共识，按照合作共赢的原则，继续发挥经贸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做大“蛋糕”。可从以下方面重点推进：

**一是加强医疗卫生合作，保持两国医学界紧密联系。**在抗疫药品研发生产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时，在抗癌药物、相关治疗技术等领域也可扩大合作。

**二是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加强合作。**中美两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合计占世界的42%和44.5%，而且都以化石能源为主，美国为82%、中国为85%。双方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天然气勘探开发等传统能源领域有合作空间。在CCUS、特高压输变电、智能电网等方面各有特色，可以互学互鉴。在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及氢能领域具有优势互补的条件。

**三是取消贸易战以来加征的高额关税，共同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规则透明度。**

**四是加强数字经济合作。**美国数字经济发展全球领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在数字技术、数字贸易等方面有合作潜力。

**五是共同推动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WTO需要改革以适应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去年中美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约37%，若能携手推动WTO改革，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

美国特斯拉公司去年向全球市场交付了近94万辆新能源汽车，其中在华销售达32万辆，占全球份额34%。

# 从挑战中看到机遇



王冬胜 (Peter Wong)  
香港总商会主席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

**面对新冠肺炎、供应链瓶颈和地缘政治问题，人们感觉带来以往数十年经济增长的全球经济架构正在分崩离析。但由于有数字革命，我们有理由相信贸易和投资的蛋糕会变得更大。**

在观察日常新闻的人看来，带来以往数十年经济增长的全球经济架构正在分崩离析。这导致人们把关注点放在问题上面，比如新冠肺炎、供应链瓶颈、地缘政治等，而错过了依然存在的机会。例如，由于有数字革命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贸易和投资的蛋糕会变得更大。

我给大家看一些 2021 年与疫情前的 2019 年的贸易统计对比。贸易总额估计达到了 28 万亿美元，增长 11%，这是全球贸易。亚洲与美国的贸易增长了 11%，其中中国约占 50%。亚洲与欧洲的贸易增长了 13%，亚洲内部贸易增长了 14%，中国同样占到其中的 55% 以上。所有的实际贸易额都处在创纪录的水平。

在 2018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IMF 估计，如果亚洲拆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其 GDP 会更快增长，达到 7%。最近生效的 RCEP 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良好一步。尽管澳大利亚和日本对中国有政治说辞，但它们都签署了这

项协议。协议成员国的总人口是 22 亿，占世界人口的 1/3，GDP 则占全球的 30%。

另外，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显示，到 2030 年，全球 2/3 的中产阶级住在亚洲。中国目前约有 3 亿中产阶级人口，到 2030 年还将翻一番。毋庸置疑，亚洲潜力巨大，它带来的巨大消费需求将推动未来地区和全球的贸易与投资。虽然我可以想见，技术等敏感的战略产品会脱钩，但我看不出与普通消费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会脱钩。事实上，我真的不觉得那有的选择。



**由于有数字革命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贸易和投资的蛋糕会变得更大。**

“

重建供应链会产生额外成本，这对两国来说是两败俱伤。



关于数字转型投资带来的机遇，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据，2022 年到 2024 年期间，全球在数字转型方面的支出预计达 6.3 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 2.1 万亿美元。全球经济中大约 2/3 的电子产品是在亚洲生产的，所以，全球数字化支出的增加会促进亚洲的出口和贸易。

气候投资方面，据 IMF 估计，未来 20 年全球气候相关投资将达到 20 万亿美元。在中国，预计到 2060 年相关投资将达 31 万亿美元，每年大约是 7800 亿美元。

“

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30年，全球2/3的中产阶级住在亚洲。

过去两个月里，我与亚洲至少 30 个不同行业的客户进行过交谈，其中许多在中国，内容是关于他们的计划，也就是改造他们的生产设施，使之达到碳中和。总的说来，他们觉得事情不好办，需要帮助。从这些讨论中，我可以看到三个机会：

第一，会出现一个碳中和知识产业，因为每个行业都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这就创造了新机会，比如咨询。

其次，企业需要对研发、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这就要有人才、筹款活动和新的产品，等等。

第三，实现碳中和会有一个过渡期，所以，碳信用交易市场的增长潜力十分可观，因为全球各行各业有数以百万计的公司。不用说，机会是巨大的。

最后我想总结几点：

首先一点是机遇，它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存在。如果一个市场关闭，人们就会寻找另外一个市场来代替，至少是部分代替。但是，重建供应链会产生额外成本，这对两国来说是两败俱伤，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

第二点是风险，它有可能减缓中美之间以及全球的贸易与投资。举几个例子：

- 新冠疫情持续恶化；
- 军事冲突；
- 中美之间缺乏高层对话和协议；
- 美联储缩表及缩减购债规模，并为抑制通胀而加息。

# 权力转移 呼唤新规则



赵令欢 (John Zhao)

弘毅投资董事长、总裁

**世界应该欢迎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欢迎它们遵守原有规则，同时参与制定新规则，以应对新环境和新技术。开展协调合作和公平竞争的领域是非常多的。**

过去 30 年到 40 年的形势一直不错。针对贸易的投资给世界带来诸多益处，当然包括美国和中国。实际上，形势非常良好。我们如今谈论世界的时候，不可能不提及美国和中国。现在，我们谈到了“脱钩”。我们谈到了将两国关系由合作重新定位为竞争，好像竞争是新鲜事一样。过去 30 年，企业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企业。实际上，正是通过企业竞争，我们得以生活在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随着不断发展，新的实力大国出现，比如中国。所以，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平衡，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想先反思，然后再仔细分析差异，重新定义美中两大经济体的关系——似乎我们一直都是竞争对手。这两大经济体受益于很多压力，涉及到协调竞争和合作。而我们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体系。

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需要实现新的平衡，这本身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他发言嘉宾也已经清楚地察觉到这种困境，但这并不都是坏事。重新认识彼此的冲动非常强烈。

相互依赖实际上是一种力量。过去三年，我们面对的是贸易战、新冠疫情和所有层面的流动中断。但贸易和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合作似乎是默认的需求，想要“脱钩”是难事。这就体现了相互依赖。

在此，我想谈谈对未来的一些看法。我认为，

协调合作与竞争应该是美中两国政府的态度。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种权力转移，认识到需要制定一套新规则。世界应该欢迎中国这样实力强大的参与者，欢迎它遵循原有规则和参与制定新规则。在很多领域，可以通过新方式协调合作。当然，还包括公平竞争。

我们需要完善全球治理，主要原因是数字经济的出现以及无处不在。这不是针对中国，虽然中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些领域，我们拥有很多政府政策层面的新合作领域，比如数据安全和隐私。姑且把它们统称为“数字监管和政策”。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丰富经验，通过交流和协调决策，美中经济体可以受益颇丰。因此，不仅中国可以把自己的蛋糕做大，与国内人民公平分享，世界经济的蛋糕也可以受益，规模更大，分配得更好。我感觉，合作的机会多于“脱钩”的机会，而且在所有层面，特别是现实层面的决策上，我们都可以发挥作用。



# 商业是一项团队运动



克雷格艾伦 (Craig Allen)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中国和美国都有义务通过公平、透明、合法的方式对待对方公司，从而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短期内，我们还需要开展贸易和投资定期磋商的框架。**

我是热忱的全球主义者，也是美中经济交往的坚定支持者，但我也现实主义者。必须指出的是，在华盛顿和北京，安全和国防机构在界定整体双边关系方面确实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在这两座首都，它们都获得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拥护者的有力帮助。在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对商业的看法确实相当低，但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商业活动，似乎喜欢对公司进行微观管理，以实现政府规划的社会目标。很抱歉，我对形势的展望有点暗淡，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竞争环境。

此处，我想借用体育打个比方。体育运动中，有时必须经常防守，有时又需要发起进攻。然后，还需要知道何时在防守和进攻之间转换。对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这样的商业组织来说，现在是侧重防守的时机。我认为，无论经济保护主义出现在哪里，我们都有责任公开指出它，特别是当它披上国家安全问题的外衣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呼吁两国政府充分履行其世贸承诺。张晓强先生谈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两国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我认为，应该坚持让两国政府充分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目前为止，在这方面还要采取行动。我认为，两国政府遵守国际劳工组

织的规定是有益的，比如强迫劳动的问题。还应该记住我们多年前学过的经济学课程，并且提醒政府，干预自由市场将导致生产力降低，增速放缓，增加腐败机会，最终降低所有人的繁荣水平。

让我感到担心的是，中国政府谈论“自力自强”，美国政府谈论安全的供应链。我认为，政府对企业供应链的干预很少产生可持续的有益效果。我认为，两国政府都在“脱钩”，企业应该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在美中两国，我们应鼓励务实，更加依赖市场原则。

两国政府都有义务通过公平、透明和合法的方式对待对方公司，确保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无论它们是本土公司还是跨国公司。世贸组织的基本前提，是进口产品应获得与国产产品一样的待遇。忘记了这一

“

**在华盛顿和北京，安全和国防机构在界定整体双边关系方面确实处于主导地位。**



让我感到担心的是，中国政府谈论“自力自强”，美国政府谈论安全的供应链。我认为，两国政府都在“脱钩”，企业应该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

点，我们就没有做好防守。我们也不能一直防守。为了让球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特别是着眼长远的话，我们也需要发动进攻。我认为，发动进攻的最好方法是要求两国政府实施 CPTPP 规定的监管结构。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做起来要比中国容易得多。由于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订的协议，CPTPP 中多达 95% 的内容已纳入美国法律。但是，由于中国提交了加入 CPTPP 的正式申请，我认为对中国的私营部门和外国公司来说，要求中国未来的所有法规符合 CPTPP 是合理的。我知道这是个长期过程，但需要立即开始。

近期内，我认为我们需要正面解决关税问题。如果两国政府能够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表明最终有可能放松关税，而且这些关税不是永久性的，我会欣喜若狂。这并不容易做到，但绝对有可能通过谈判相互延长关税排除。这没有太大难度，而且非常有用。

短期内，我们还需要一套会谈框架，需要某种形式的定期贸易和投资磋商，可以围绕中立的议程展开，比如 CPTPP。我认为这也非常有用。必须承认，我并不看好短期内的形势。中国过于追求“自力自强”的目标。美国正积极构建全面



的印度 - 太平洋经济框架，我对此不太兴奋，但那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坦率地讲，正如其他发言者提到的，尽管存在紧张局势，双边贸易在过去两年一直增长。美国的对华出口在 2020 年增长 17%，预估 2021 年增长 11%。我知道这和张晓强先生提供的数字不一致。我们可以就此开展讨论，但方向是一样的。这是好事。公司有适应新环境。我认为 RCEP 非常好，将为重视亚洲市场的美国公司带来更多机会，哪怕不能帮助到美国出口商。同时，两国政府之间缺乏沟通，敌视情绪越来越明显，都非常令人担忧。简单来说，如果要建立更可预见、可持续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包括但不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美国和中国需要沟通。

总之，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的公司可能拥有非常相似的观点，即如果希望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同时做到出色的防守和果断的进攻，以便在讨论时保持自身观点的现实意义。否则，安全问题将占据主导地位。如果这是一项团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其他企业合作，我们就可以推动议程，也将实现更大的成功。



如果要建立更可预见、可持续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包括但不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美国和中国需要沟通。



# 全球供应链



# 如何给经济车轮注入润滑油



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兼海曼教授、名誉教授

**这个世界需要思考，怎样才能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不是让全球 / 区域贸易体系朝更封闭、经济效率更低的方向演变，让体系中合作的动机越来越弱。**



**许多因素已经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尤其是在亚洲，而且未来的力度会更大。**

我扼要地说三点：

第一，如果说我们面临的供应链问题，特别是涉及美国和中国的供应链问题，仅仅是新冠病毒及其没完没了的变体带来的，那就太过轻率简单了。公平地说，新冠肺炎加剧了我们供应链上的所有问题，不过，就算明天出现神奇的治疗或预防方法，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它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我们要应对的是一种长期的非周期性趋势，而不只是短暂的混乱。

话虽如此，但新冠疫情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零新冠政策让全国死亡率极低，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它实际上也切断了人力资源的流动，而这对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不认可跨境疫苗接种，特别是中美之间，这种做法正在堵塞全球化的动脉。

第二，许多因素已经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尤其是在亚洲，而且未来的力度会更大。首先，全球供应链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相对成本，而美国的利率正在上



David Lampton 大卫·兰普顿



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焦虑正日益加剧，例如，台积电决定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制造先进芯片，就是这一现象的最明显例子。

升，我们要预计到这会是一个长期趋势。这将影响供应链采购的选择。此外，中国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上涨，而东南亚国家相对更优的劳动力成本，加上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让它们可以去竞争将来的采购投资。

而且，在中国、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强大的政治话语是自力更生，即使以经济效率下降为代价，也要保住本国社会的就业。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些都让在国内或周边采购的决策更具有吸引力。

最后，最致命的考虑是，中美之间在战略上互不信任。随着中国和美国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将对方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我们看到，研发活动和关键技术的采购决策正转向国内，或至少是海外更安全的地方。

坦率地说，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焦虑正日益加剧，除非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实现战

略稳定，否则这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被考虑因素。例如，台积电决定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制造先进芯片，就是这一现象的最明显例子。

第三，这让我们想一想，怎样才能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不是让全球/区域贸易体系朝更封闭、经济效率更低的方向演变，让体系中合作的动机越来越弱。美国和中国必须扩大它们的共同点，而增加信任是互相依赖的基础。做不到这一点，前景就会恶化。

要重点关注中美两国在疫苗和疫情方面的双边及全球合作。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落实之前的贸易协定，让人们相信达成新贸易协定是值得的。我们双方都有兴趣在同一多边贸易安排中合作，如CPTPP、RCEP、亚投行等。最后，两国安全机构必须将两军对话和建立信任措施制度化。

当每个人说私营部门会找到解决办法的时候，似乎很多人都点头赞同。我很大程度上也相信这一点，但有时候，政府可能会设置障碍，使之变得非常困难，而且越来越失去效率。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努力清除政治和战略关系中的根本障碍，这样才能培养信心，让双方愿意相互依赖，愿意建立全球供应链。



美国和中国必须扩大它们的共同点，而增加信任是互相依赖的基础。做不到这一点，前景就会恶化。

# 现在，坏消息是……



威廉·艾伦·赖因施 (William Reinsch)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高级顾问兼学术主席

**期待中美两国在政府甚至企业层面就供应链加强合作，“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打算谈谈供应链政治，并提出美国观点。我要说的是，如果大家期待中美双方在政府甚至企业层面就供应链以及供应链的发展加强合作，我想那不会发生。

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些原因与中国无关，但有些原因与中国有很大关系。

**第一，美国的公司正在进行一场变革，也就是缩短供应链，使之更靠近本土。**这甚至在特朗普当政之前就开始了，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它不是一次浪潮，不是大家都在这么做，但你可以看到它在一点点地发生。他们想缩短供应链，这实际上意味着从亚洲撤出，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想离客户更近一些。更大的一个原因是运输成本波动的不确定性，例如，燃料价格波动，或运输延误。疫情加剧了这些问题。现在的形势比过去更加不确定了。

特别是在中国，零新冠政策导致位于供应链前端的工厂关闭，而我们这边的公司不得不应对这个问题，工厂关闭，你们知道，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人们会考虑其他选择。我想，企业还在应对日益增加的政治风险，在涉及中国时尤其如此。我认为，总的来说，在现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建立弹性和备援的压力确实变大了。

“

**如果大家期待中美双方在政府甚至企业层面就供应链以及供应链的发展加强合作，我想那不会发生。**



**你们看到的将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  
而不是一时之间的反应。**

---

我认为，过去两年经历的疫情已经向美国人表明，我们无法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这给公司带来很大的压力，除了刚才提到的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表外，它们还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供应链，要增加它的弹性。这告诉供应链管理，除了A计划，你还需要B计划，还需要C计划，其中一个可能就是需要在美国生产。

所以，很多人都在反思，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了解供应链的人都知道，调整需要很长时间。在供应链的任何环节，如果新供应商认证了任何出于健康、安全或环境目的而受到监管的产品，那么，它们都需要与监管机构打交道。这些事情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你们看到的将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而不是一时之间的反应。

不过，造成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我认为这始于美国公众对中国越来越负面的看法。11年前，美国人对中国的总体看法是，持正面看法的占53%，到去年持负面看法的占到78%。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公众舆论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大部分发生在过去5年。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美国公众眼里的中方敌意行为促成的，其中许多与经济无关。中国

在南海的行动，针对台湾、香港和新疆的行动，都疏远或激怒了大部分美国人。

也有经济上的问题，我相信出席会议的每个人都很了解，它包括美国人认为的不公平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对外国的歧视。这些基本上都是特朗普说的事情，而且准备拿到“第二阶段”协议中讨论（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但问题都在那里。

如果你问现在的政府，我们与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什么，答案会和特朗普的清单一样。所有这些问题累积起来，最终结果就是对中国、对与中国做生意的负面舆论急剧增加。

我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的经济欺凌，以及它对在某些方面不按中国政策走的美国公司的挑衅，不仅进一步疏远了政府，也疏远了企业。我觉得，后一种做法大大增加了在中国经营业务或与中国做生意的政治风险。

如今美国的情况是，政客们紧跟国内的民意调查，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两党都如此，但目前失去权力的共和党人尤甚，他们把它作为竞选的议题。

虽然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3年，但已经有4、5名共和党参议员要参加竞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就是民主党人尤其是拜



**如果你问现在的政府，我们与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什么，答案会和特朗普的清单一样。**

---

“

但这种趋势，其发展方向将是回归，或者是近岸外包。

登总统对中国态度的软弱，正在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他们正互相攀比，看谁能提出对付中国的最极端强硬的建议。这些不会付诸实施，但会让总统处境艰难。他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他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是为了改善双边关系，都会被对方批评为向中国屈膝投降，削弱我们的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说，预测未来一年两国总体关系将维持现状的人，他们很可能说中了。除此之外，拜登政府一向直言不讳地鼓励回流，也就是把制造业和生产带回美国。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口头上说说，但最终，可能会要求国会制定财政激励措施，也许是税收抵免，

以鼓励企业重新回到美国来投资建设。有些企业会这么做，有些不会。

但这种趋势，如果有趋势的话，其发展方向将是回归，或者是近岸外包。选址不一定要在美国本土，但要在近处，对我们来说就是墨西哥、加拿大、中美洲和西半球其他地方。

这些都在进行当中。就像我说的，它是零敲碎打的，是耳闻的。公司决定怎么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商业模式，很多是取决于它们在中国现有的投资程度，以及它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或牺牲这些投资。但来自政府的压力很明显，我们希望你回家。而且，

公司也看到越来越多与政治经济风险有关的理由。疫情激发人们对供应链的反思，也正好与之吻合。

因此，我认为说到底是，虽然两国政府都表示，不打算强迫企业在它们之间做选择，但实际上两国都在推行鼓励企业这样做的政策。中国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推动技术自主。在要结束的和新的五年规划及其他出版物中，你们可以读到这些政策。我刚才讲了美国人在做什么。我们在拆散企业，我们在分开国家。我预计短期内，很遗憾，只要两国政府仍由同样的人掌权，事情就不会有任何变化。。



“

虽然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3年，但已经有4、5名共和党参议员要参加竞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就是民主党人尤其是拜登总统对中国态度的软弱，正在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他们正互相攀比，看谁能提出对付中国的最极端强硬的建议。

# 全球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和出路



王一鸣 (Wang Yiming)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为了确保全球供应链稳定，我们需要从根本上优化分工协作，还必须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

我就讲三个话题。

## 一、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这次冲击应该说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看到过的，从能源、芯片、汽车、电子产品，主要经济体都遭遇了供应链的瓶颈。那么疫情的冲击跟自然灾害的冲击还不太一样，它对供应链冲击是全球性的，似乎每个角落都受到了影响，不仅是生产系统，而且运输物流也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芯片，芯片对汽车的生产造成了巨大冲击，去年二季度以来，由于芯片的短缺，美国和德国的汽车生产都大幅度回落。我们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计算，去年第三季度汽车生产拖累了美国GDP环比增长1.5个百分点。二是物流系统，港口大堵塞，海运的费用大幅度上升。我们看到连续几个月美国的补库存都在下降，如果物流状况改善了，我估计美国补

库存的速度会明显的加快。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疫情的冲击。

## 二、过去一个时期供应链发生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不断的深化也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供应链有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的维度，二是纵向的维度。横向主要指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的集中度。



“

供应链有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的维度，二是纵向的维度。横向主要指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的集中度。纵向的集中度指主要上下游的关系，就是有自然资源、有不可替代技术的国家是处在上游，像中国这些加工型的国家是处在下游，所以很容易受到上游卡脖子的风险。

“

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器，是一个外在的表现，深层的原因是结构性问题。比如说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特别是中美的战略不信任。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生产的集中度是在提高的，中国、德国、美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三个生产中心，中国也成为一个最大的自成品出口国，所以，中心以外的经济体就会处在对中心国家的过度依赖，这个是横向的集中度。纵向的集中度主要指上下游的关系，就是有自然资源、有不可替代技术的国家是处在上游，像中国这些加工型的国家是处在下游，所以很容易受到上游卡脖子的风险。比如美国技术对中国卡脖子，包括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供应紧张，都会造成卡脖子的问题。

这都是全球化的结果，应该说这种集中使得全球的经济规模效益提高，生产成本下降，消费者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它带来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集中度高了脆弱性也增大了，所以这次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应该是把效应——就是集中带来的脆弱性的效应进一步放大，这是它背后的机理。

### 三、供应链的稳定性出路在什么地方

表明上看供应链的危机是疫情带来的，但是我觉得更深层的原因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贸易和产业领域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器，是一个外在的表现，深层的原因是结构性问题。比如说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特别是中美的战略不信任，美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我理解美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所以美国政府特朗普时期就采取加征关税，限制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对中国企业实行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另外，也在推动一些企业回归美国本土。这些做法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

紧张，也加大了全球通胀压力，所以无论是芯片荒、物流受阻，都只是这些供应链受到冲击的外在表现，本质里面是这些结构性问题。

我认为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要人为的改变市场的选择，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私人机构是没有动力调整的。所以，现在往往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在推动，比如美国总统任命了工作小组，在去年6月份发布了对美国供应链脆弱性的评估，聚焦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原材料还有原研药4个方面，这表明美国希望重新调整供应链。

欧洲同时也在这样做，他们都是希望牺牲一定的效率来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但是事实上这种短期的安排，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所以全球化背景下，人为的通过政府的调整或者推动产业脱钩，以政治的力量来改变经济规律的做法，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提高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深化、分工、合作，并且利用新一代信息数字技术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

“

这次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应该是把效应——就是集中带来的脆弱性的效应进一步放大，这是它背后的机理。

# 半导体全球供应链有分裂的风险



郑力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不确定性使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面临分裂的危险，生产成本将因此增加35%–65%，相关产业和世界经济将受到冲击。**

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我代表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就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问题分享我们产业界的一些观点和思考。

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CSIA），它是中国权威的半导体行业协会，目前会员单位近800余家，会员产值占中国半导体全行业产值的80%以上，同时也是世界半导体理事会（WSC）成员，与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以及其他区域国家半导体行业协会构筑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半导体全球市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2019年以来出现了下滑。过去三年由于新冠疫情防护，数字经济以及碳中和等因素的推动，支撑202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由负转正，实现10%增长，具有里程碑意义；由此展

望203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有望达到9000亿美元。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销售市场，也是半导体全球供应链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中国半导体进口达到了3767亿美金，并且在过去几年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国家/地区。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电子市场和消费电子制造能力，给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半导体产业带来巨大的机会。

半导体全球市场从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前景一片光明。但是毋庸讳言，最近三年以来，半导体产业发展道路上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新冠疫情可能在未来几年仍然会继续干扰半导体全球供应链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作为产业链上两个主要国家，中美贸易摩擦仍在继续，也为半导体脆





半导体的全球供应链有分裂的风险。如果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分裂，全球产业界至少需要增加5000亿到1万亿美金的额外投资，并且会导致半导体产品35-65%成本增加。

弱的供应链和刚刚恢复的全球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和危机。地缘政治仍然在给半导体产业增加不确定性，产业链互信受损并叠加疫情导致的芯片短缺问题还在持续。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原本运作良好，基于全球合作的半导体产业的未来会蒙上阴影，半导体的全球供应链有分裂的风险。据业界评估，如果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分裂，全球产业界至少需要增加 5000 亿到 1 万亿美金的额外投资，并且会导致半导体产品 35-65% 成本增加，进而传导到相关产业，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这些风险如果不加以管控，多年来半导体产业共同努力形成的良好发展格局和产业链互信就会受到破坏，相关企业将不得不基于底线思维来评估并应对供应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被迫推动半导体供应链的多元化和独立自主化，从而使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脱钩成为事实，如果放任这样的情况发生，半导体全产业会受到严重打击，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对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我们中美半导体产业界都深感焦虑。作为半导体从业者，都希望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能够尽快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与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常务秘书长张立先生与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 John Neuffer 先生共

同呼吁半导体产业间应努力加强合作来推动全球半导体市场良性发展，保持供应链稳定和健康发展；针对未来几年的机遇和挑战，产业界加大协同向两国政府提供理性、聪明的建议，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中美协会双方认为应该无条件地取消对纯商业性技术、大众化商品如消费类电子芯片的出口管制限制，并一起推动利用半导体领域的碳减排合作。建议中美半导体产业界应共同努力发声，向双方政府建言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重回良性竞争和市场化资源配置轨道，以维护全球半导体行业繁荣发展。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合作将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我们承认中美双方的分歧和隔阂仍然存在，但充分和坦诚的沟通始终是解决问题，面向未来的方式方法。





# 气候变化

# 我们没有时间了



杰佛瑞·萨克斯 (Jeffrey Sachs)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教授

**30 年来，世界一直在讨论气候问题，但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原因，未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突破。这是政治腐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缺乏合作渠道。**

我认为形势是非常清晰的。正如大家所说，30 年来，世界一直面临着气候变化问题。30 年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但我们一直没有成功阻止排放量增加。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唯一成功之处，是将温度继续上升到非常可怕的水平，而且加剧了升温速度。

我们现在比工业化以前的温度高 1.2 摄氏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把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度以下。换句话说，我们还有 0.3 摄氏度的空间。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地球的升温速度可能是每 10 年 0.3 摄氏度，或者更快。未来几年内，我们很有可能超过 1.5 摄氏度的目标。詹姆斯·汉森博士是世界知

名的气候学家，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他警告说，下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有可能在 2023 年或 2024 年出现，届时地球温度将呈现危险的跃升。

正如大家所说，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别无选择，只能合作。当然，我认为任何情况下，我们小组的每个人以及世界上所有头脑健全的人都希望这两个国家在众多领域进行合作，比如阻止疫情、全球发展、帮助消除贫困以及气候变化。

正如大家所说，气候问题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必须合作。现在就要行动。

太好了，解振华教授也参加了这个小组。

“

我们讨论气候变化已经30年，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这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原因。

他是中国气候行动领域里了不起的杰出领导者，是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各国的好朋友。大家刚才提到，他和约翰·克里特使在 COP26 上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我需要提醒一下：美国不是一个团结的政府。

我们知道，前国务卿克里是我们的优秀外交官，全心致力于去碳化道路，拜登总统也是如此。但我们现在无法让立法获得美国参议院的通过。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他自己拥有煤矿。情况就是这么糟糕。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是一个非常腐败的政府，政界里充斥着金钱，但这甚至不是间接腐败。想想看，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拥有煤矿。所以，我们的有效行动面临着太多障碍。

美国内部缺乏合作。我们和中国的合作存在困难。我认为，可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拖延时间。如果你们国家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或天然气，你们政府行动迟缓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我们讨论气候变化已经 30 年，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这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原因，这是因为我们政治中的腐败，并不是因为我

们缺乏合作手段，或者说我们的经济缺少果断去碳化的手段。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在每一项主要去碳化的技术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包括低成本的光伏发电、低成本的风力发电、低成本的大规模水力发电、长距离高压直流输电、5G、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电池以及电动汽车。中国确实有能力占据技术领先地位。我认为美国也有能力占据技术领先地位。我们应该展开合作，而不是陷入美国发起的技术战，何况这种战争没有任何意义。

我的观点是，我们并不缺少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实际上没有时间了。

我想感谢所有的小组专家。他们都是这一领域的伟大领导者。我想鼓励解振华教授继续努力，寻求与美国的合作。我们也在美国国内采取行动，告诉美国人：“合作吧。让我们参与其中，有所行动，停止拖延。国内确实存在问题，但我们正在应对。我们希望构建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开展合作”。



“

中国确实有能力占据技术领先地位。我认为美国也有能力占据技术领先地位。我们应该展开合作，而不是陷入美国发起的技术战，何况这种战争没有任何意义。

#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解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加强对话，全面落实《巴黎协定》。我们希望美国也能够为气候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我简要介绍近一年来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科学证明，气候变化已从未来的威胁和挑战变成现实的风险和危机，需要全球携手采取行动共同应对。在去年 11 月召开的 COP26 世界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书面致辞，提出维护多边共识、聚焦务实行动、加速绿色转型等三点重要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重要政治动力。大会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表明了全球合作应对气

候变化的决心，坚定了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信心，明确了全球努力的目标、原则和规定，加速了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两国有利、对全球有益。自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就通过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和生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前，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中美两国领导人要求我们通过特使渠道开展双边对话交流，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中方对此始终持积极开

放的态度。我很尊重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先生，他是我的老朋友。经领导人批准，双方于去年4月发表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宣布“走向未来，中美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旨在使与《巴黎协定》相符的升温限制目标可以实现”并“讨论21世纪20年代的具体减排行动”。双方商定在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措施与技术，可再生能源，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节能建筑，绿色低碳交通，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国际航空航海排放及其他政策和措施等八个领域开展对话交流。

去年11月，在COP26气候大会谈判陷入胶着的情况下，两国发表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为COP26提供了解决分歧的着陆区，并进一步明确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两国计划在以下方面开展合作：

- 1，支持有效整合高占比、低成本、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政策；
- 2，鼓励有效平衡跨越广阔地域电力供需的输电政策；
- 3，鼓励整合太阳能、储能和其他更接近电力使用端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分布式发电政策；
- 4，减少电力浪费的能效政策和标准；
- 5，合作加强甲烷排放的测量；交流各自加强甲烷管控政策和计划的信息；并促进有关甲烷减排挑战和解决方案的联合研究；
- 6，双方计划通过有效执行各自关于禁止非法进口的法律，共同支持消除全球非法毁林。



同时，双方计划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包括继续开展政策和技术交流、识别双方感兴趣领域的计划和项目、举行政府间和非政府专家会议、促进地方政府、企业、智库、学者和其他专家的参与、交流各自国家努力的最新进展、考虑额外努力的需要，并评估联合声明和联合宣言的实施情况。

中美两国特使及团队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通话、会晤的要求和精神，在一年时间内举行了31次视频对话，4轮面对面长时间会谈，相互交底，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寻求最大共同点，增进理解，增加互信，从重启对话交流到同意开展合作，进而准备建立联合工作组，推动合作务实化、机制化，取得了显著进展。

各位同事，格拉斯哥大会成果来之不易，《巴黎协定》将全面进入实施阶段。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多边主义，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加强对话，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的全面和有效实施。同时，我们也希望美方在其他领域为双方在气变领域合作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造福两国人民，造福全人类。

# 中国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措施



刘燕华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原主任

**中国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措施包括：政策手段、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并且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规定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三个时间节点：2025年、2030年、2060年。**

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中国在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方面的举措，也就是手段。我觉得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政策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市场手段。

## 一、政策手段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在之后的讲话当中也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总结为这么几条：

- 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 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5%；
- 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 “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

“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 要加强非二氧化碳气体的管控；
- 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 不再新建境外的煤炭项目。

这些是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一些基本的目标。

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中央层面对碳达峰碳中和这项重大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意见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的10项重点工作任务：

- 1、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 2、深度调整产业结构
- 3、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 4、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 5、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

- 6、加强绿色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
- 7、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
- 8、提高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 9、健全法律法规标准和统计监测体系
- 10、完善政策机制

在《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有三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到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到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到2060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

这个《意见》的发表是中国政策体系，就是“1+N”政策体系的总纲，1是总的战略方向，N指的是方案（有关部门和单位将根据方案部署制定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领域以及具体行业的碳达峰实施方案，各地区也将按照方案要求制定本地区碳达峰行动方案）。还包括科技支撑、碳汇能力、统计核算、督察考核等支撑措施和财政、金融、价格等保障政策。

这个《意见》发布之后，这就是对全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一个总体安排。在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聚焦“十四五”和“十五五”两个碳达峰关键期，提出重点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包括：

-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 节能降碳增效行动
- 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

- 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
- 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 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
- 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
- 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 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 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

这些行动也是对我们整体工作的近期工作指导。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工业、交通、城乡建设等领域的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的行动方案已经基本编制完成了，有些已经公布，有些在审核之后就公布，然后就去实施。这就是想说的第一个，就是政策措施。

## 二、法律手段

目前，中国正在研究在新形势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问题，包括：将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监管、国际合作等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地位、工作目标和法律要求；规定各部门的法定职责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与交易机制，规范开展全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为政府分解落实气候变化应对目标，开展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提供法制依据。

这体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决心，逐步与全球气候治理接轨。（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约20个国家和地区已制定应







中国和美国可以联合在一起，在第三方——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支持他们的绿色发展，这也是一个方向。

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发展促进法。)

目前，在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已经开始进行了很多工作，比如说200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提出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要纳入到立法议程；2015年中国明确提出，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法律法规；2015年成立了立法的起草小组；2018年中国又明确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这些都是做一些准备，中国的气候变化立法应该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要针对中国已有的有关生态环境的立法进行修订，中国已有的有关环境的立法一共有13个法，都进行修订。同时，要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其他问题进行立法，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立法方面要制定新形势下的绿色标准体系、核算体系、报告核查制度以及政府与社会的责任制度。我们相信，中国今后的气候变化立法一定会为国际气候治理做出贡献。

### 三、市场手段

应对气候变化还要靠市场，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市场来解决的。市场手段主要方向是完善经济政策，包括构建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完善绿色电价政策，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建立健全市场化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套制度，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等。

目前，中国在碳排放交易方面已经全面启动，是在2021年7月启动的。主要是通过市场，由政府确定配额，由市场来定价，这项工作在法律上属于民法的范畴。中国目前还没有实施碳税制度，因为碳税制度属于公法的范畴，要等到气候立法确立之后才能够全面考虑。中国目前是不支持碳边境调节税的做法，因为它关系到在国际贸易、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责任分担问题，这就是市场手段。

最后，谈一些个人的想法，中美关系现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在应对气候变化任务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中美在哪些方面可以开展一些合作。我觉得有四个方向可以谈：

1、国际气候治理制度的完善，特别是推动《巴黎协定》。中美是两个排放大国，应该能够发挥作用。

2、开展双边合作，尽管中美关系现在很复杂，但是在气候合作方面，中国的省和美国的州之间开展合作还是很有可能的，特别是开展全方位的交流。

3、中美之间是不是可以考虑在第三方的合作，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些制度安排、需要一些技术，中国和美国可以联合在一起，在第三方——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支持他们的绿色发展，这也是一个方向。

4、要积极开展二轨对话，就是民间交流，通过民间二轨对话，通过交流减少误解，不断扩大共同点。同时，也为政府间的合作铺平道路。

# 人文交流



# 一种与众不同的交流



马克斯·鲍卡斯 (Max Baucus)  
美国前驻华大使

**除了现在并不是特别理想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低调且频繁的商业往来。这些往来也是一种交流。它们培养互信。**

我们两国之间以前拥有相当频繁的双向交流。我们的部长在官方层面上交流。当然，企业家也有往来。一些企业家不希望我知道他们要来北京，虽然我是美国驻华大使。他们和中国政府有业务往来，而且是双方都受益的生意。此外，还有非常丰富的文化交流甚至军事交流以及非政府组织间的往来。这相当不错。

但一切都变了。部分原因是特朗普，部分原因是美国对华近乎疑神疑鬼的政治氛围。当然也有新冠疫情的原因。我非常紧张和担心，担心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这种恶化会带来很多问题，何况是疫情才促进了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可能很难和中国就气候问题达成协议。背后的原因很多。第一，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第二，说实话，拜登总统不是中国专家。他的经验主要涉及欧洲和中东，大多数白宫工作人员也是如此。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我认为，这使得他们很难制定出对华政策。他最近受到批评，就是因为未能推出对华政策。我认为，这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基本上，他还是在延续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甚至态度更强硬，采取更多制裁。

想补充一点，拜登现在正忙着应对俄罗斯、乌克兰和伊朗，很难关注到气候问题。此外，与美国国会打交道也是困难重重。正

“

## 除了现在并不理想的文化交流，好消息是我们两国存在很多低调、频繁的商业往来。

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这是民主国家的缺点之一。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缺点，专制国家也是一样的，都很难采取行动并看到效果。拜登总统目前的处境比较艰难。

坦率地说，除了现在并不理想的文化交流，好消息是我们两国存在很多低调、频繁的商业往来。我们两国都有大量的商业交易和企业家。我认为，如果大家愿意交流，那么商业往来是很好的交流平台。它能培育理解和信任。此外，金融机构对在中国做生意非常感兴趣，而且中国已经向美国金融机构敞开了大门。中国知道，接触美国的金融专业知识和美国在华金融投资能够极大地帮助到自己。

回到气候问题。有趣的是，对冲基金和企业家都认为投资气候技术是门不错的生意。大家知道，他们的目标是赚钱。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我们应该鼓励那些希望继续在中国做生意或投资绿色技术的企业投资气候技术。我想，他们也会进行相关投资的。

最后一点是气候问题。我想，我们两国进行了很多会谈，如何达成共识？克拉克总理也指出，这是这两个大国必需的。因为现在的美国对中国的信任极低，至少在政治层面和政府高层上。中国不仅宣传自己采取的气候行动，同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气候行动。如果中国想展示 ABCDE 之类的行动，并且真

正贯彻落实到位，就会被美国媒体报道。这些行动能够获得关注，实现两个目标。

首先，这些行动是有益的，属于一种交流。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但可以增进两国间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解决面临的气候问题。但是，不要期望美国会采取重大行动，因为当前双边关系不断恶化，而且主动权也在中国那边。中国可以采取行动，是因为它实行威权制度。习主席同意，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省长就会照做。他们的行动越多，获得的关注越多。而且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都能获得关注。这是一种交流，我想也是有益的。毕竟，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交流现在少之又少。现在，我们需要找到其它发展两国关系的方法。

我想说的是，几天之后，我将在华盛顿特区和约翰·克里见面。届时，我将转达解振华先生对我这位好朋友的美好祝愿——我以前曾和克里共事过。同时，解振华先生或许可以给我些建议，应该向克里传达哪些信息。此外，我将在周日会见中国驻华大使秦刚，也会向他提及此事。

第三点，我在家乡蒙大拿州建立了鲍卡斯研究院。我和休利特基金会交流过，他们将提供一笔丰厚的资助。这个研究院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和气候。所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在努力做自己能做的。



# 一位乐观主义者的几句话



查尔斯·福斯特 (Charles Foster)

福斯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副主席

**人们相互了解，造成信任缺乏的障碍就减少，合作机会就大为增加。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正如鲍卡斯大使所说，人文交流方面的情况令人气馁，因为事情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我是过分乐观的人。今天我将继续本着这种态度分享看法。

当然，我们听说美国人都知道当前美中关系不断紧张，背后的原因是在贸易、供应链、人权和民权等广泛问题上存在分歧。不幸的是，由于美国国内的反华言论和中国国内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太多人接受了一种违背常识且危险的零和博弈心

态。遗憾的是，讨论这些挑战的时候，往往没有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巩固我们重要的双边关系。

“

一直以来，建立信任的成功方式之一，便是重要的文化交流。

“

人们相互了解，阻碍信任的壁垒就会崩塌，合作的机会就会大幅增加。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现在最重要的是合作，共同减少碳排放，找到我们共同的人性，塑造解决我们两国共同挑战的意愿。

实际上，我们双边关系里的这些问题和难题更加凸显了一点，即两国更应该尝试建立信任，不仅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一直以来，建立信任的成功方式之一，便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我参加过这些文化交流。我们各位与会者都知道，我们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源于对对方的无知；就像大使先生说的那样，这在美国更是如此。我们是一个大国，但往往对其他国家知之甚少。

通过人文交流，我们不仅了解彼此间的差异，也了解我们共同的人性，以及增加包容性的优势和乐趣。我是我们基金会的代表，而乔治·W·布什总统体现了这种精神。大家知道，他是我们的第二任驻华特使，1974年到1976年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深度与中国人民接触，被称作“骑自行车的大使”。我不知道鲍卡斯大使是否也在北京骑过自行车，但乔治·布什肯定骑过。

布什总统卸任后，我有幸和他共事，应对各种各样的双边问题。我从一开始就听到他一直这样说：对美国来说，对华美

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实际上，福特总统提出让他担任驻伦敦或巴黎大使的时候，他拒绝了，虽然这两个职位都是美差。更让所有人困惑不解的是，他说自己更愿意被任命为驻华特使，因为早在1974年，他本能地认识到中国的潜力，也认识到未来美中双边关系对人类的重要意义。

他的儿子尼尔布什是我的好朋友和我们基金会的主席。他经常介绍当年和兄弟跟随父亲一起访问中国的事情。大家都认识他的兄弟，知道当时在北京的街上，他们被看作北京动物园的外来物种。我理解这一点，因为作为1978年美中友好代表团的一员，我很早就去过中国。当然，现在情况都变了。



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和开放。给大家分享个故事。1979年2月，邓小平访问休斯顿时，我有幸陪同他两天。正因为此次出访，中国在休斯顿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他表示想访问当地的能源公司，和公司工作人员交流。他也想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约翰逊航天中心，并与代表团一起前往西蒙顿牛仔竞技场。那是一个很小的私人牛仔竞技场。我想在座的部分与会者还记得这些。

我记得，当时有两位骑马的女牛仔。我知道鲍卡斯参议员去过很多牛仔竞技比赛。这两位女牛仔骑马过来，俯身递给邓小平一顶牛仔帽。他接过来，然后戴在头上。我看到摄影师们疯狂地拍照。多年来，这张照片象征着美中关系的开放，而当时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比今天差得很多。

文化交流不仅可以教育民众，拓展视野，还可以舒缓政治紧张局势，开放市场和应对冲突，从而为未来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奠定牢固的基础。经常有人问我是如何成为移民律师的，而我经常归功于我有幸参与的一次文化交流项目，有机会在南美学习国际法。这一经历改变并且深刻影响了我的事业，也改变了我的整个国际视野。

首先，焦点是紧邻德克萨斯州的墨西哥，然后是拉美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中国。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机会这样做。当时，我们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一直感觉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参与当时的对华交流活动，否则我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不是西班牙语。

人们相互了解，阻碍信任的壁垒就会崩塌，合作的机会就会大幅增加。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虽然我们存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基于文化和教育的不同观点，这个故事仍然可以创造一种未来世界愿景，我们共同帮助民众脱贫，扩大教育和卫生服务覆盖范围，增加经济流动性。我们刚才讨论到，现在最重要的是合作，共同减少碳排放，找到我们共同的人性，塑造解决我们两国共同挑战的意愿。实现这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我们拥有非常牢固的人文交流基础。这些交流将极大地提升我们两国合作造福人类的可能性。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的指导原则是，如果缺少美国和中国的有效合作，几乎所有全球挑战都无法通过持久或者有意义的方式得到解决。参与频繁、坦诚、生动的双边对话是布什总统对美中关系愿景的支柱，也是我们基金会继续推动的事业。

“

如果缺少美国和中国的有效合作，几乎所有全球挑战都无法通过持久或者有意义的方式得到解决。

# 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章新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原主席、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裁  
教育部原副部长

**人文交流是后疫情时代一个好的起点。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将如何合作。因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我们正面临一个大疫情，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未来的趋势是根本性的转型和变革。这次的疫情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仅涉及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我们从中应该得到警醒：

1、我们现在这种发展范式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基本走到尽头，包括消费模式，难以为继。

2、新冠病毒疯狂的肆虐，不分人种，不分国家，也不分宗教信仰。它把全世界的人们逼到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同舟共济。只要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不能从新冠病毒中脱险，全球就仍然不能摆脱疫情的侵扰。因为无法独善其身。我们不仅是只能同舟共济，而且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中美两国如何携手，鲍卡斯和福斯特都谈了很好的意见。因为我本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去留学，之后又到美国两次留学，所以我的经历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得

益于中美关系的恢复正常化，从尼克松总统来和周总理、毛主席握手，到卡特总统和邓小平主席签定协议恢复关系的正常化。但今天，我很担忧，二战过去了70年，冷战过去了30年，中美关系恢复了40年，什么使得现在又走向了冲突的境地，又走向了某些还在冷战的可能性、脱钩？难道我们不能有智慧和冷静地找到办法吗？

所以，我觉得人文领域的交流至关重要，它是基石。下面我谈四点看法：

“

新冠病毒疯狂的肆虐，不分人种，不分国家，也不分宗教信仰。它把全世界的人们逼到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同舟共济。





人民和人民的交流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是一个  
润滑剂。

### 1、人文交流是润滑剂

人文交流是润滑剂，确实是这样。人文交流包括体育、艺术、民间智库、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交流，我恰巧都经历了，无论是在政府服务期间还是退下来以后。所以，我的感觉，它应该是个基石。人文交流实际上就是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就这点来看，我们国家的政府一向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习主席提出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生命为根本；美国政府提出民用、民智、民享，这方面两国政府有相通的一一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但是为什么现在人文交流却受到了政府的主导？这个问题我非常想不通。人民交流起的作用大家非常清楚，我们有30多年的对抗，但这个对抗发生转变正是因两个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和科恩相互交换了礼物。这件事情毛泽东主席看到以后积极地推动了它，尼克松总统给了积极回应，我想在座的两位美国朋友你们都是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感谢你们当时所做出的努力。因此说，人民和人民的交流是可以创造奇迹的，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是一个润滑剂。

### 2、两国关系面临十字路口

而且两国越来越朝极端方向走。我们听到两种声音：一个是坚持本国优先，激励推

行对抗、脱钩、零和博弈。刚才鲍卡斯讲了，您觉得现任美国总统还是跟前任的总统一样，对中国问题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我们感谢您有这样的朋友，也有福斯特主席这样的朋友。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定要真正深入的了解，这是一种声音。另一种声音，是支持合而不同，促进各大国合作，找到共同点，认为不能搞零和博弈。就这点来说，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在教育领域里能够找到突破的基础。

想起我当年陪同耶鲁大学的校长时，当时中美关系还非常好，他就提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难免会有曲折，政治会有冷热，但是大学之间，人民和人民的交往要保持一个非常坚实、稳定、长期的管道，因为政府的更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民之间的交流是有根本的需要。在大学来说，我们都知道大学是个学术自由、追求真理的地方，教授们之间由于共同的课题、共同的学术兴趣以及对真理的探索，他们就会走到一起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大学的交流中，我听不少高校，不仅是校长而且教授表示非常担忧。

最近，留学生开放一些，昨天我又看到报道，美国的航空公司会突然中断留学生的航班。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应该坦诚，应该本着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不要去阻挡民间和人民之间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我觉得在教育方面，我们的交流还不够平衡，比如说我们已经有很多非常开放的办法，在中国有很多中美合作的大学，在苏州的哈佛大学韦茨创新中心，在上海的纽约大学，在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等，我觉得它们非常的了不起，我也在两个大学里兼顾问。尽管遇到这样的曲折，我们仍然在推动这样的合作和交流，现在我们仍然在美国有30万的中国

“

过度强调文化认同，认识到只有本民族，没有其他民族，只有我优先，只有我一切独特，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相互相连的世界，认同里就含有不认同，就会产生排斥。



大学生。我们看到，看到美国政府一些做法，家长因为非常担心子女的安全，就会犹豫要不要送子女到美国去。我们还是告诉了还应该去，因为我们还要着眼于未来的交流。

### 三、如何构建在人文领域的交流

我想到，现在非常突出的就是需要和平，需要冷静。我在教科文组织服务过，70年前 UNESCO 的建立，大家知道主要是美国、中国、英国三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是个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他曾说过“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我觉得他这样的说法至今仍然适用于我们。同时在 UNESCO 大家当时有共识，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彼此的习俗和生活习惯缺乏了解，这是世界各个民族的猜疑和互不信任的普遍原因，而这种猜疑和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之间产生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

我们就是要在人民的思想里构建和平的屏障，人文交流、人民之间的交流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在交流中，我们有个终极的话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觉得有两个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去重视，也就是交流要认可多样化和多样性的问题。文化多样性其实起源于生物多样性，生物界只有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才能增加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同样，在人文交流中，要承认多样性，人类也就是向自然母亲学习，所以人类才会进化到今天这样。如果我们不尊重自然，不尊重生态的规律，人文交流中不承认多样化的话，很难维持交流，所以千规律、万规律，自然规律第一律。

所以我们感谢大使先生和主席先生，你们两位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不要先贴标签，说是什么制度，是什么宗教，我觉得这样沟通会非常有利。中方我们吃饭用筷子，西方吃饭用刀叉，我们养小孩是朝天睡，美国养小孩是趴在地上睡。我 1980 年在美国留学

“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 四、促进人文交流不断稳定健康发展的方法

我提三个关于路径和方法的问题：

1) 一定要坚持接触的政策，要有接触就要有对话。就像经济中心章主任每次搞的对话，只有对话才能增进了解。我在教科文组织的时候处理过在联合国大会不能处理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就是世界遗产，这个冲突已经到了对抗的地步，但是我还是坚持一条（对话），虽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到会场就会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仍然取得了共识。

2) 有矛盾，有差异，最好的办法是求大同存小异。这是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我觉得上海公报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做的。

3) 找到利益共同点。在相当多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我们还是有益结合点的。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准备后疫情时代，我们讲怎么恢复得更好，当然是非常理想化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的论坛要准备后疫情时代到来，尽管现在是德尔塔、Omicron，特别是中美在一起携手、世界在一起携手的这个怎么做？我觉得还是人文交流先打开出路。

“

我们要准备后疫情时代，我们讲怎么恢复得更好，我觉得还是人文交流先打开出路。

的时候听美国朋友讲，他的祖母给儿孙讲和中国有不同，我们现在是早上，你们现在是晚上，有很多不同的，正常。

第二个观点就是要尊重人类的共性，这是无比重要的课题，我们说共同体的概念是来自于人类的共性。在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如果过度的推行民粹主义，过度的强调民族主义，就会加大国家民族区域文化分化对立乃至冲突。

全球化，同时在经济、科技密切相连接的同时，也必然会引起文化与政治的排斥。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发出了警告，当时还有不少界别对他的观点有所误读，认为是鼓吹冲突。今天，我仔细想，因为他的课我也旁听过，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还是具有远见的，他是一个学者，因为他的思想有一个概念就是推行文化认同。认同什么？自然是认同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像我们说的乡愁一样。但是过度强调文化认同，认识到只有本民族，没有其他民族，只有我优先，只有我一切独特，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相互相连的世界，认同里就含有不认同，就会产生排斥。

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进行人文交流来说，既要强调多样性，又要认识到人类的共性，这对于我们是有益的。

“

有矛盾，有差异，最好的办法是求大同存小异。

# 推动人文交流是恢复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

**要取得重大进展，关键有三个步骤：一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第二，审视双边人文交流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重启这些交流。**

这里我谈三个观点：

## **一、要落实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就要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与合作**

2021年以来，中国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拜登总统有两次通话和视频对话。在11月16日这次视频对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拜登总统也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讲，历史是公正的，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中国在50年前就是一个大国。

我认为，拜登总统讲话的时候是非常清醒的，讲的话也是非常正确，但是走下台来，有很多做法和他自己讲话是非常相悖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美国朋友谈到的对中国了解不够，五千年是一个概念，但是五千年是有具体内涵的时间长河。如果美国尊重一个具有5000年伟大历史的国度，就不要选择现在对中国的战略与打法。

## **二、应该站在维护人类思想活力、维护人类**

## **最大共同利益的角度，正确认识中美之间人文交流的意义和价值**

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昨天在论坛上美国一位朋友所讲的事情。他说，从美国皮尤中心调查结果看，原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率达到53%，最新调查对中国的反感率则达到76%。其实，我昨天也看了几组数字，是美国知名的公关公司爱德曼公司发表的全球信任度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和皮尤中心调查结果，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调查了28个国家，中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1%，位居世界第一；对企业的信任度84%，位居世界第一；对媒体信任度80%，位居世界第一；对医疗信任度93%，位居世界第一；对中央银行信任度91%，位居世界第一；对NGO的信任度80%，位居世界第二。这个是美国最著名的公关公司，连续20多年发表了全球信任指数调查，这些调查是随机的，不是中国政府和任何机构报送的数字，因此，我认为这个结果是客观的，也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还有一个数字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连续10年在全球展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也是几

十个国家，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连续10年都保持在90%以上，我记得在疫情中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3.1%，也是全球最高的。还有，全球权威刊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对50个国家所做的抽样调查，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是高达94%，这个数字也是在疫情中做调查得出的数字。

我就在想所谓“民意”，民意到底是什么东西？民意是可以改变的，拜登执政刚刚开始的时候，民意支持率高达70%多，最高的时候达到76%，现在下降到30%多一点，一下子就腰斩了。所以，对于民意，我们包括全球其他国家，既要重视民意，又不要完全被民意绑架。如果是持续的像对中国的民意调查，而且又是第三方做的民意调查，连续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都是这样的民意，我觉得这个民意调查结果肯定是成立的，这个结果的民意基础是强大的，民意基础也是非常稳固的。

但是，如果说像美国在大选前、大选后总统执政一年内民意调查结果就腰斩，这种民意就具有极大的变异性，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从众心理。在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反智主义泛化，不仅是在美国，也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当这些东西占主导地位时，民意形成的趋向和不同的价值观，则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而且，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是由无数个变量来组成的，形成了很多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非稳定性的极端复杂问题，尤其是一些变量来自于人的自由意志或者莫测的心理，这些都是无法统计的个性。人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一个国家意愿和一些政客简单的判断。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意，显然皮尤中心调查结果反映了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仍处在变动之中。美国一些政客嘴里天天说的话，并不代表美国民意。我要强调对于民意的看法，这是从人文的角度认识中美关系的一个视角。



对于民意，我们包括全球其他国家，既要重视民意，又不要完全被民意绑架。

### 三、站在人类文明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重建基于信任与尊重的中美人文交流新格局

这一点我觉得是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疫情持续两年多阻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现在大家的交流只能变为线上。实际上，我们大家看到的对方，都是一个可以动的照片，虽然照片在说话，但是很难有线下真实的互动和交流对话。这种虚拟的会议很重要，但是它和真实的感觉还是不一样。所以，刚才章部长说要谋划后疫情时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 提几点建议：

1、中美之间要融合深度的交流合作，不能满足以前一般性的来来往往，当前特别需要共同开展对人类文明的再认识或者深刻反思。

世界特别是中美两国，应该推动一场世界性的思想革命，共同寻找人类的共同价值，超越所谓的普世价值。比如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是王道，还是霸权？是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是破坏自然环境，还是保护自然环境？是文明共存，还是文明冲突？这些问题都是对人类文明的再认识。我觉得，世界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出现了各种问题与混沌，需要有一场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和人类共同认知，思想处于这样的混乱和混沌之中，世界上很多这种基础理论和认识没有搞清楚，就很难找到正确的方向。

2、要拆除有形的墙，更要拆除无形的墙，



## 人民的友好交往是国家与国家友好相处的源头和活水。

梳理造成中美两国之间误解、误判、误读的问题，认真地倾听彼此的声音。

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政治不一定要成为一场狂怒的大火，摧毁一切它的路径。但是，从美国现在采取的行动来看，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冬奥会政治化，把所有的地缘关系问题政治化，而且还极端化、污名化，我想，拜登政府变成了想直接烧坏中国的一把狂热大火，火燃烧的面积越来越大，拉更多的盟友入伙点燃大火。但是，美国想摧毁的东西不一定能摧毁，反而会惹火烧身。像新冠疫情一样，2020年2月2日美国率先撤离在武汉所有的人员，那个时候美国政客认为可以隔岸观火，但是这把火在美国燃烧的更烈，是熊熊大火，大家看到美国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据说美国准备取消公布美国新冠疫情确诊病例，不再公布死亡的病例，届时美国将成为“零感染”的国家。

所以，其实我们在人类人文交流、思想交流方面形成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形成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你隔岸观火，明天火可能就烧到了你的身上，这也和贸易战一样，特朗普打贸易战初衷是为了打击中国，但是最后正如美国的财长耶伦所说，94%的高关税的负担是由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共同承担，这也是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3、推动人文交流合作。刚才章部长谈的特别好，谈了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4、厚植两国人民以及所有国家人民的友谊，人民的友好交往是国家与国家友好相处的源头和活水。

### 除了章部长讲的，我补充几点：

1) 要抓紧恢复中美 100 多个对话交流机制。特朗普执政以来，直到拜登政府，现在仅有的四个机制，正常交流也没有完全开展起来。

2) 要筹划后疫情时代放开旅游，一方面预防疫情，另一方面如何恢复人与人的交流，国家与国家的交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3) 加强教育合作。美国有 5762 所大学，中国有 2956 所大学，我在江苏太仓看到美国在太仓办的杜克大学，那个大学办得相当好。中美的教育合作可以更加深化。

4) 要加强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智库交流合作不仅是论坛只是谈谈看法，我觉得更要进行深度研究。

我们中心曾经和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做过一些共同的研究，如未来中美十年经贸关系的研究，比如说中美基础设施双向投资的研究，对当时认识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研究成果在美国发布，有 200 多家媒体进行的报道。这项研究当时是董建华先生牵头做的，中心曾培炎理事长、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负责，我担任课题组长，当时发布的情况还历历在目。这个研究初衷是为了美国和中国经贸关系更加紧密，预测未来十年中美经贸关系合作的美好前景。没有想到还不到 10 年，就出了一个特朗普总统，开始与中国打贸易战，所以特别遗憾。

总之，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思想交流非常重要。谢谢！



# 误入歧途的傲慢



王栋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聘正教授

**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西方错误地认为中国会向西方价值观靠拢。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其实更好。**

我想提出三个观点，分别是哲学、思想和经验层面上的。

首先，哲学层面的观点。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国内两党对与中国接触的共识——我称之为“旧的接触共识”，包含着一种错误的认识，把中国视为“他者”，需要“改造”和“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其中隐含的期望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会在经济甚至政治上越来越像美国。这种谬论与中国古代寓言“刻舟求剑”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一天，有个人准备渡河，坐上了一艘渡船。渡河过程中，他不小心把剑掉进了水里。这个时候，他拿出一把刀，在船舷上刻下：“这是我把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到岸后，这个人从船舷上的标记处跳到水中，希望找回自己丢失的剑。当然，他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

现在，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对华战略接触政策失败了。背后是有原因的。“旧的接触共识”里的期望，即中国将逐渐转变，最终变得像美国一样，就像那个人刻在船舷

上的标记。美国的精英们应该做的，是平等对待中国、尊重中国，而不是把中国看作需要改造的“他者”。

问题是，虽然拜登和政府高层官员公开承认，华盛顿不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美国的精英群体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视为决心挑战和取代美国霸权的威权国家。因此，他们发誓要和中国“竞争”，捍卫美国的优势地位。

第二，思想层面的观点。华盛顿利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言论，参与到“定义他者”

“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国内两党对与中国接触的共识——我称之为“旧的接触共识”，包含着一种错误的认识，把中国视为“他者”，需要“改造”和“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的过程，其中包括非人化和妖魔化中国，诬陷中国专制、实行高压政策和富有侵略性的大国，对抗美国及其盟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世界”。通过吹捧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华盛顿毫不掩饰其诬陷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里的规则破坏者的意图。

更糟糕的是，关于价值观和规则的言论背后，对华竞争策略里可能有含蓄的种族主义色彩。比如，去年9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美国需要和欧洲合作，以“减缓中国的创新速度”。最近，欧盟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丰特列斯在11月的某个论坛上说：“我们西方人，包括美国和欧盟，一直在统治着世界……我们是运用技术的主宰……如果我们不再制定标准，将无法统治21世纪。”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优越感和赤裸裸的傲慢态度着实让人震惊。然而，其内在的种族主义穿上了一层意识形态话语的外衣，为维持西方的世界主导地位的行动进行辩护。美国对华竞争策略里的种族主义，还体现在近年来新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崛起。我昨天看到新闻，联邦调查局已经撤销了针对麻省理工学院陈刚教授的案件。这是特朗普政府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里最突出的案例之一，而现在这个计划早已臭名昭著。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美国如果希望制定进步的对华政策，这种种族主义倾向应该加以约束和纠正。

第三，经验层面的观点。我想和各位尊敬的小组专家一起，强调我们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作为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的执行主任，我多年来参与了许多交流项目。查尔斯·福斯特先生可能对此很了解。通过与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的合作，我们进行了三次对话，分别聚焦经济和贸易、安全以及阿富汗。

另外，2016年起，我们和卡特中心、《环球时报》合作，每年联合举办美中青年学者交流研讨会。

去年4月10日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为此，我们举办了庆祝青年学者交流研讨会五周年的特别活动，邀请到50多位历次论坛的参与者。吉米·卡特总统亲切地给青年学者送上热情的鼓励话语。此外，我们组织了几轮乔治敦大学和北京大学间的学生交流活动，包括去年关于气候变化的交流。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年轻人相聚在一起，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包袱，进行真诚、坦诚、相互尊重、热烈以及引人思考的交流。习近平主席多次说过，“中美关系的希望落在年轻人的肩上”。确实如此。尽管疫情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带来不确定性和困难，得益于Zoom等技术，我们仍然能够相互沟通，尽管规模要小得多。我还赞同章部长的最后一个观点，即我们应该为后疫情时代的交往做好准备，而且人文交流应该在我们两个社会的重新“挂钩”过程中发挥领先作用。

“

更糟糕的是，关于价值观和规则的言论背后，对华竞争策略里可能有含蓄的种族主义色彩。



## 中美交流基金会简介

中美交流基金会于 2008 年在香港设立，基金会坚信，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两者的积极关系对于世界的福祉至关重要。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实体。

## 中美聚焦网简介

China-US Focus（中美聚焦，[www.chinausfocus.com](http://www.chinausfocus.com)）由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于 2011 年在香港成立，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专注中美关系的网络媒体。中美聚焦网站为中美问题的专家、学者、智库和意见领袖搭建了一个交流观点、理性探讨中美关系的平台，成为两国民众和世界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Tung Chee-hwa  
First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rgaret Chan  
WHO Executive Director

Rajiv J. Shah  
President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Kishore Mahbubani  
President of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Lawrence Lau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Erna Solberg  
Prime Minister of Norway

Mary Robinson  
The Elphinstone Institute

Filippo Grandi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He Yafei  
President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Vanessa Kerry  
President of the Asia Society

Jeffrey Sachs  
President of the Earth Institute

Thomas Bach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eter Piot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Global Health

Helen Clark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Muhammad Yunus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Conversations by James Chau of hope and purpose with* Tung Chee-hwa, Thomas Bach, Margaret Chan, Helen Clark, Filippo Grandi, He Yafei, Vanessa Kerry, Kishore Mahbubani, Peter Piot, Mary Robinson, Jeffrey Sachs, Erna Solberg, Rajiv Shah,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Muhammad Yunus, **and more.**